

## 國際關係的典範發展

---

林碧炤

(國立政治大學外交學系教授兼副校長)

### 摘要

國際關係的教學始於 1919 年，90 年以來，國際政治變成了國際關係，再變成了世界政治或全球化的國際關係，學科的成長十分快速。而國立政治大學外交學系正好成立八十週年，為紀念這兩個有學術意義的週年慶，本文就以 1962 年孔恩(Thomas Kuhn)所提出的典範(paradigm)這個概念來說明和分析國際關係學科的演變。經由這些典範的分析，我們可以很清楚的看出國際關係的科學基礎還是需要再強化，它處理實際外交問題的能力也一樣要強化。和其他社會科學一樣，國際關係不應只有學術研究，不去面對和解決人類面臨的各項問題，它的未來發展不會有太大的遠景。

### 關鍵詞

典範、現實主義、自由主義、社會建構論

## 壹、為什麼要用典範來理解國際關係

國際關係開始傳授之時並沒有使用「典範」(paradigm)一詞，在中國和其他文明古國，外交被認為治國之道的一部分，由良師策士來負責，傳授的是謀略，和今天社會科學所講求的方法、理論及追求的目標不完全相同。如果把當今的國際關係完全看成是政策分析，傳統的謀略確實是有參考的價值。可是在 21 世紀的高等教育，這樣的學科研究已經過時，國際關係和其他的社會科學學科一定有規則可循。即使今天歐洲國家的博士研究還是依循傳統的師徒制，它一樣是講求社會科學的研究方法。<sup>1</sup>

國際關係從 1919 年之後在大學講授，最初是借用歷史學、政治學及國際法。很長的一段時間，沒有自己的理論。在政治思想的領域之中，本來就有現實主義和自由主義的分類，最早把這個理論的分類介紹到國際關係的是卡爾(E. H. Carr)，<sup>2</sup>這兩大理論一直使用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後。在歷史學和政治學的講授中，理論是非常重要的。它通常是一組或一個複雜的歷史或政治事實的濃縮，然後提出非常簡要的觀點或論述。有了理論作為基礎，學習者在觀察政治變化時才有所憑藉，在提出解釋時也有所根據，當然在尋找解決方法時，也才有所指引。沒有理論作為基礎的歷史或政治只是一大堆事實或千變萬化的現象，每個人的解釋各有不同，更因為是零散的事實或資料，它也就談不上是系統化的科學。這樣的歷史在完整的一手資料支撐下，它還是有它的學術價值，可以稱之為信史，可是它的科學性及學術價值會受到質疑。古今中外的歷史研究總有一個最基本的命題、或假設、或觀點，它不論是「大國的興衰」、「大國的悲劇」、

---

<sup>1</sup> 國內外國際關係的相關研究所最常用的教科書 James Dougherty and Robert Pfaltzgraff, Jr., *Contending Theorie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New York: Longman, 2003).，這本書對於研究方法並沒有說明。James Rosenau ed., *International Politics and Foreign Policy* (New York: Free Press, 1969)還是有用的專書。閻學通、孫學峰，*國際關係研究實用方法*(北京：人民，2001年)有簡要的說明。

<sup>2</sup> 最有代表性的著作是 E. H. Carr, *The Twenty Years' Crisis, 1919-1939* (New York: Harper & Row, 1964).，這本書在 1939 年就出版，到今天還有參考的價值。

「數字管理的社會」、「帝國主義的形成及擴張」、「民主和平」，相關的史據是要去證明這些基本觀點或假設的正確性。

政治學的理論比歷史學更為豐富，不論是西洋或中國政治思想都是如此。<sup>3</sup>從政治學進到國際關係則是一個選擇的過程，大部分把政治學理論有關和平或戰爭的部分加以延伸和發揮。另外就是主權的主張更具關鍵性。沒有主權作為政治和法律的基礎，國際關係失去最根本的核心。主權又和民族國家、民族主義和國家利益密切結合，成為國際關係的共同理論架構，國家不論大小，它們的專家及決策人士一定會忠實的把握這些基本的原則，不會輕易讓步，甚至根本拒絕妥協。

這樣的學術傳統一直延續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冷戰的開始使得國際關係研究變得更迫切，尤其美國在過去是執行孤立主義政策，可見美國的外交政策是守勢和被動的，國際關係的研究沒有受到足夠的重視。等到第二次大戰結束，前蘇聯對外擴張、共產主義的世界革命幾乎無法避免，美國擔任起世界警察的角色，國際關係就成為顯學。<sup>4</sup>

「典範」的提出不是為國際關係設計的，它是由孔恩(Thomas Kuhn)率先使用，主要是在說明任何科學都有它的知識社群，而社群一定會有共同的研究方法、解釋依據或範例，理論當然也包括在內。<sup>5</sup>由於社群本身的研究，自然會帶動學科的改變，典範不可能永久不變，典範的轉移是必然的，科學的革命也是一樣不可避免。這個論述最先使用在自然科學，特別是物理學，以後社會科學，尤其是國際關係也跟著使用。「典範」的使用確實有不少的優點。首先，國際關係和其他社會科學形成一種「科學一體化」的共識，也就是說國際關係的研究應該是遵循一般科學的方法，達到科學的要求，要有客觀、求真的態度，同時小心的求證。其次，科學社群對於任何學科的成長是很重要的。國際關係的知識社群非常年輕，彼此

<sup>3</sup> 早期常用的資料就是 F. I. Greestain and N. W. Dolsby, eds., *Handbook of Political Science* (Reading, Mass.: Addison-Wesley, 1975).

<sup>4</sup> 到今天為止，國際關係還是被認為是美國的社會科學，主要的教科書幾乎是由美國的大學或出版社出版。

<sup>5</sup> Thomas Kuhn, *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2 & 1970).

之間還需要有共同的學習才能使同僚評量更為客觀與公正。最後，「典範」的使用可以讓個人價值的影響降到最低，但國際關係的研究不可能沒有個人的價值判斷，特別是歷史和政治事件的解釋或歷史經驗的採納。「典範」所展現的是社群中共同使用的價值標準範例和理念，這在人文學科中更為重要。社會科學經常涉及到公共政策的問題，「典範」正好是提供解決方法的思考依據，例如經濟援助本身就是相當有爭議的政策議題，沒有共同的「典範」，要在國際社會中推動經濟援助是不容易的事。

雖然有這些優點，「典範」並非受到所有國家知識社群的採納。就連「知識社群」一詞也是只有在西方國家或高等教育及科學研究比較上軌道的國家才採用。<sup>6</sup>在多數的開發中國家或低度開發國家，國際關係知識社群根本不存在，談「典範」並無實質的意義。這些國家的國際關係研究要不是沒有，就是剛起步而已，而外交政策幾乎完全由國家領導人掌握，他不需要知識社群。其次，國際關係的研究反映出每個國家特有的文化、傳統及價值。如何和西方國家或世界的主流思潮接軌並沒有共同的做法，因此，「典範」的涵義在西方國家是相同的，可是在非西方國家，它要不沒有廣泛使用，就是失去了學術的啟蒙或指導的作用。

站在研究和教學的角度，知識一定要流傳才有價值，也才能發揮影響力。而廣為流傳的條件是要使用最為通用的文字來表達，今天所指的是英文，將來或許會被別的文字取代，但要等待一段很長的時間。另外就是要使用共同的典範來進行研究，發表研究成果，或者將它落實成為外交或內政的政策。共同的典範並不排斥不同的文化、理論或主張，但是完全不相容的理論或互相排斥的主張也就無法形成共同接受的典範，當然也就沒有典範轉移或科學的革命可言。使用了共同典範並非表示所有的研究必須使用英文來表述，非英文的語言也是相當流行，而且必要。以中文撰寫的國際關係論文或專書一樣可以達到世界級的「典範」，法德日俄或西班牙文的著作也是如此。只是目前主流的國際關係理論幾乎都是英文撰寫，非英

---

<sup>6</sup> Peter M. Haas, "Introduction: Epistemic Communities and International Policy Coordination,"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46, No. 1(Winter 1972), pp. 1-34.

文的專書或論文比較難有世界性的影響力或普及度。

歷史學、政治學、經濟學、軍事科學、社會學的國際關係都有它們的典範存在，並且是西方國家知識社群奉行的標準，今天在台灣、中國大陸、日本、韓國和印度或東南亞也是如此。亞洲的知識社群使用共同語言、研究標準來分析共同關切的問題，同時找出解決的方法。這在地區整合和衝突預防兩方面最具代表性。長期發展下去，對於地區安全的維護將有積極的幫助。今天的聯合國、亞太經合會，甚至於更早的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關稅貿易總協定(即今天的世界貿易組織)，或者在亞太地區日漸活躍的東協區域論壇，都是經由這樣的過程，先透過「典範」的轉移，最後成為大家共同接受的區域論壇或組織。這也是專家們預測以前「歐洲協調」(Concert of Europe)發揮了維持歐洲秩序的功能，以後被國際聯盟吸收，再成為聯合國的安全理事會，以後亞洲如果也出現了亞洲協調或亞洲安全會議就不令人意外。<sup>7</sup>

有些專家認為國際關係其實不必如此複雜，它的工作既然是避戰求和，維持秩序是最主要，講求的是知識和經驗的傳授及運用，至於要不要使用「典範」並不重要，即使用了它，國際關係的科學性離經濟學、心理學還是有很長的距離。更何況在「典範」出現之前，專家們早已使用不同的名詞來表達他們的見解，例如「觀點」、「視野」、「模式」、「意識形態」、「體制」(regime)和理論，<sup>8</sup>其中又以「體制」引發的討論最多，因為它的中文譯名以何者為妥，在華文社會就有太多不同的意見，在其他的非英語社會，專家們乾脆不予翻譯。到今天，還是有不少專家認為「體制」還是比理論或典範更合乎國際關係的學科現狀。如果說亞太安全的典範可以用，亞太安全的體制顯然更能描繪出實際的情況。更何況在國際關係的領域中，

---

<sup>7</sup> Amitav Acharya, "The Emerging Regional Architecture of World Politics," *World Politics*, Vol. 59, No. 4(July 2007), pp. 629-52. ; Amitav Acharya and Evelyn Goh, eds., *Reassessing Security Cooperation in the Asia-Pacific* (Cambridge: MIT Press, 2008). ; Kent Calder and Francis Fukuyama, eds., *East Asian Multilateralism* (Baltimore, Maryland: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2008).

<sup>8</sup> 「regime」自從 Stephen Krasner 在「國際組織」專刊介紹之後，中文的譯名到今天相當分歧。

「貿易體制」、「糧食體制」、「環保體制」或「政治體制」更為普遍。基於這些原因，論者以為「典範」的使用就由不同國家的知識社群自行選擇，在西方國家既已普變採用，讓它繼續下去並無妨礙，而其他地區則由學者自行決定。

## 貳、主要的典範

典範不是無中生有，它的形成是根據人類長期累積下來的知識，其中又以哲學、歷史、政治和經濟思想為主。如何治理國家是人類長期面臨的挑戰，到今天依然如此。在這個根本的問題上，人類總是從制度、政策及謀略方面去思考和設計，而最關鍵的因素一直就是國家領導人和他所信賴的幹部。成功的領導人往往是政策符合了社會及人民的需要，而失敗的領導人幾乎都是違背民意、失去民心，當然也就失去政權。在這個根本問題之上，東西方所發展出來的制度不同，背後的主導因素就是思想的差異。官僚制度會在東方國家長期發展，而且根深蒂固，而國會制度會在西方國家開花結果，而且發揮了制衡的效果，正是政治思想的差異所造成的結果。

今天我們使用現實主義(保守主義)、理想主義(自由主義)來分析人類的政治思想及行為有很長期的歷史。最初的政治思想家或君王並沒有使用這個名詞，這是以後由學術界加上去的。不過，它代表人類開始建立國家、成立政府、統治人民之後，面對了治理的問題時所提出的基本主張。中西在這方面是相通的。只是東方國家把權力神化，以後要再使用民主的制度或方法去約束它就非常困難，<sup>9</sup>而西方國家把權力世俗化，使用法律及制

---

<sup>9</sup> Samuel Huntington, *The Political Order in Changing Societies*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68). ; Samuel Huntington and C. M. Moore, eds., *Authoritarian Politics in Modern Society* (New York: Basic Books, 1970). ; Robert Dahl, *Democracy and Its Critics* (New Haven, Connecticut: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9).

度去約束它，民主就成為可能，雖然它並不是最完善的制度。<sup>10</sup>這個最根本的差異就在於西方國家的政治傳統是面對權力的現實，以實際的態度去處理這個人類最原始的慾望，當然也是治國不可缺少的工具。這個以後被稱之為現實主義的主張主導了人類政治長達數千年，各國都有不同的理論家加以闡揚，更有太多的國家領導人奉為金科玉律。

在國際關係的領域，墨根索(Hans Morgenthau)被認為是現實主義的最佳代表，他的著作以歐洲國家的外交史作為依據，反覆的解釋國家的基本生存之道就是要維持、擴張和使用權力。<sup>11</sup>這個主張和早期的許多政治思想家是相同的，其中又以馬克維里(Niccolo Machiavelli)和霍布斯(Thomas Hobbes)為代表。在中國，韓非子、管子和商鞅的著作也有類似的主張，特別是韓非子，簡言之，就是尚法、任勢、用術的主張。<sup>12</sup>漢朝之後的中國雖然有獨尊孔子的主張，而歷代君主也是強調儒家思想的重要，可是實際的政治往往迫使統治者必須熟讀「韓非子」，於是儒表法內成為必要，以便於駕御臣下，統治如此廣大的帝國。在西方國家也是如此，基督教的盛行並沒有改變統治者對於馬克維里的喜愛，他的「君王論」或「霸術」一書幾乎是當時的歐洲君王的必備指南。

現實主義於是強調富國強兵的必要性，對於戰爭的合法性和正當性就採支持的態度。<sup>13</sup>連帶的對於國家利益、國家安全、軍事擴張和聯盟體系一樣是相當重視，這些都被認為是強化本身國力、擊敗對手或敵國的必要條件。政治優於法律，而經濟要為政治服務，民族主義和軍事勝利被認為是團結人民和提高國際地位的必經途徑。這樣主張在十九世紀的歐洲相當盛行，於是盛行的戰爭、海外殖民擴張，幾乎整個帝國主義對外的戰爭，

---

<sup>10</sup> Charles Tilley ed., *The Formation of National States in Western Europ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5). ; F. S. C. Northrop, *The Meeting of East and West: An Inquiry Concerning World Understanding* (New York: Macmillan, 1946).

<sup>11</sup> Hans J. Morgenthau, *Politics Among Nations: The Struggle for Power and Peace* (New York: Knopf, 1973).

<sup>12</sup> 王邦雄，*韓非子的哲學*(台北：東大，1993年)。；唐端正，*先秦諸子論叢*(台北：東大，1995年)。

<sup>13</sup> Hans Morgenthau, *op. cit.* ; Stephen Walt, *The Origins of Alliances* (Ithaca, New York: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7).

經濟剝奪和政治壓迫都是從這個主張找到它的合理性。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的國際社會、冷戰興起也再一度受到現實主義很深的影響，美蘇兩大強國無不根據這一套理論制定它們的外交政策。

冷戰結束之前，現實主義發展出新現實主義的主張，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經濟因素的提升、權力的性質多樣，無政府的國際社會中已經有太多的國際組織發揮功能，於是傳統的那種赤裸裸的權力之爭變得與事實不符。不過，更重要的是，現實主義者希望提出一套以經濟學為範本的國際關係理論，不再使用簡單的歷史事實作為論述的基礎，而是使用「科學一體化」的方法，把複雜的國際現象，簡化成普遍的法則，來解釋和預測國際關係。這些學術的努力以華滋(Kenneth Waltz)作為代表，他的著作和墨根索完全不同，幾乎沒有引用歷史的事件，也沒有參考西方國家的外交經驗，它就像是一本國際關係的經濟學原理或物理學入門讀本。<sup>14</sup>

不論是新或原本的現實主義受到最強烈的批評就是它根本沒有預測到冷戰的結束。由於對權力和軍事因素的重視，以後更加注意到國際政治經濟學，專家們幾乎認為冷戰的持續是必然的。戈巴契夫採取了外交新思維，德國和東歐都在改變，可是幾乎沒有現實主義者提醒國際社會，前蘇聯會瓦解，德國會統一，東歐會產生鉅變。等到冷戰結束，知識社群開始質疑現實主義的基本主張，有一度現實主義毫無招架之力，等到國際新秩序逐漸淡化，2001年的「九一一」事件發生，加上亞洲的金融危機及全世界的能源危機和其他的安全問題紛紛登上檯面之後，現實主義又重新恢復它舊有的地位。新現實主義雖然有較高的科學性，可是古典的現實主義更貼近權力政治的本質，美國的新保守主義更能展現出共和黨政府的外交政策，就連中國大陸的外交政策也被冠上新保守主義的標籤。2000年至2008年之間，美國國際關係學界對於新保守主義的討論遠超過新自由主義。被稱之為新保守主義者對於美國外交政策的影響力遠超過新現實主義者，雖然後者有不少的論文在主要期刊上發表。<sup>15</sup>

<sup>14</sup> Kenneth Waltz,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79).

<sup>15</sup> 新保守主義和新現實主義不同，簡要的分析請參考 Joshua Muravchik and Stephen Walt,



新現實主義者本來對於冷戰時期的兩元體系最為推崇，一致認為這是維持國際秩序最有效的體系。在冷戰時期，國際情勢的確緊張，美蘇兩國核戰的邊緣，要不是危機處理發揮了效用，戰爭早就爆發，而且是核子戰爭而非傳統的戰爭，它的可能後果是很難想像的，儘管有這些嚴重的缺點，現實主義者還是獨鍾兩元體系，到了後冷戰時期依然鼓吹，而且加以肯定。從國際政治的實際運作來看，兩元體系早被單極體系所替代，美國成為唯一的軍事超強，而這個地位可能還會維持一段時間。<sup>16</sup>面對單極的國際體系，新現實主義者分成二派，一派主張美國的獨霸具有正面意義，它提供的是一個穩定的秩序和市場，讓所有的國家受惠，而美國一向沒有帝國主義的野心，只有宣揚民主的信念。另一派則認為美國不可能永遠獨霸，而像過去歷史所展現的一樣，霸權一定會製造負面的示範作用，強大的軍力將誘使其他國家發展更大的軍力來抗衡，其結果將是更多的武器競賽，更難處理的國際紛爭。在美國發動對伊拉克的戰爭，而無法順利的結束戰爭，同時處理國際恐怖主義問題以及西方國家和回教世界的紛爭之後，新現實主義受到的質疑更大。它所堅持的國家間互相競爭以及零合的國際關係是否已經和 21 世紀的全球政治或全球化脫節？「九一一」事件和背後複雜的文化、宗教和理念的因素可以完全用權力角逐的觀念去解釋嗎？即使引用了國際經濟學或公司經營的理論，面對如此複雜的後冷戰國際體系，恐怕提不出一套令人信服的說明。於是有人提出國際體系事實上已進入無極化的世界。<sup>17</sup>

理想主義或自由主義是第二個重要的典範。它一樣有長期的政治思想作為基礎，其中以康德、洛克和盧梭的主張最有代表性。如果要找出和墨根索對比的專書，奈伊和克歐亨合寫的「權力和互相依賴」(Power and

---

“The Neocons vs. The Realists,” *The National Interest*, No. 97(September-October 2008), pp. 20-36.更詳細的說明請看 John Ehrman, *The Rise of Neoconservatism* (New Haven, Connecticut: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7).

<sup>16</sup> Barry Posen, “Command of the Commons: The Military Foundation of U.S. Hegemony,” in Michael Brown et al., eds., *New Global Danger: Changing Dimensions of International Security*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2004), pp. 3-44.

<sup>17</sup> Richard Haass, “The Age of Nonpolarity,” *Foreign Affairs*, Vol. 87, No. 3(May-June 2008), pp. 44-56.

Interdependence)應該是最具指標性意義的自由主義著作。<sup>18</sup>自由主義一貫的主張是以合作為出發點，創造一個互利的國際秩序，對於國際組織和國際法更為重視。對於經濟整合、人類發展和民主人權自然就持更為支持的態度，連帶的對戰爭、武器競賽、聯盟，甚至於富國強兵的主張就採取比較冷淡的看法。簡言之，自由主義比現實主義站在更高的角度，認為各國應該更重視全體人類的福祉、利益及安全。也只有全世界或全人類得到進步與發展，個別的國家才有遠景可言。

如果冷戰時期的美蘇對抗是現實主義最風光的時期，歐洲整合所塑造的新政治經濟以及冷戰結束之後的 10 年毫無疑問是自由主義的鼎盛時期。<sup>19</sup>歐洲整合證明戰場可以變成市場，而合作及互利的共同市場或關稅同盟遠比傳統的軍事聯盟帶來更大的利益，當然也就得到更多的民意支持。其實回顧國際關係的研究，任何專家都會發現，知識社群或決策者都是先嘗試自由主義，等到他們了解權力政治才是國際關係的本質，而各國最關心還是自己的利益之時，他們才回頭再從現實主義中為叢林法則找出一些脈絡。國際關係是那麼現實的權力爭執，經過數世紀的演變還是如此。冷戰的結束為自由主義帶來無限的希望，福山的名著「歷史的終結和最後一人」得到如此高的評價，頓時國際社會充滿樂觀的期待，民主將是最大，也是最終的勝利者，新的國際秩序將在集體安全和預防外交的交互運用之下，讓人類享有更久的和平。戰爭有可能再發生，可是世界性的大戰已經不可能，因為最大的挑戰者—蘇聯，已經瓦解。

另外一波的國際思潮為自由主義帶來了更大的動力，那就是全球化的大趨勢所引發對國際關係的重新詮釋。<sup>20</sup>它不但從資本主義制度的興起、

<sup>18</sup> Robert Keohane and Joseph Nye, *Power and Interdependence: World Politics in Transition* (New York: Little Brown, 1977). 這本書以後修訂再版兩次，內容大幅更新。

<sup>19</sup> 一般都參考 Ernst Haas, David Mitrany 以及 Robert Keohane 的書，其實 Andrew Moravcsik, *The Choice for Europe: Social Purpose and State Power from Messina to Maastricht* (Ithaca, New York: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8). 有另外一個層面的分析。

<sup>20</sup> 這一方面的著作太多，最有代表性的著作是 David Held et al., *Global Transformation Politics, Economics and Culture* (Stanford,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最暢銷的書是 Thomas Friedman, *The World Is Flat* (New York: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工業革命帶來的轉變、生產通訊和交通工具的更新所造成的巨大推力、以及資訊科技和資訊化社會所促成的結構性改變，自由主義幾乎完全主宰了全球化國際關係的理論，而現實主義只有退居幕後。不久，俄羅斯使用能源作為外交政策的工具達到大國復興的目標，重新在亞歐的心臟地帶恢復了昔日的霸權地位，而中國崛起也是事實，太多的專家在新現實主義和新自由主義之間爭論不休。一方面資訊化、全球化的國際社會使得新冷戰的可能性大幅下降。另一方面，中國崛起所帶來的軍事現代化是相當明顯的。今天，人民解放軍的實力已經與 1949 年大不相同，而俄羅斯重新恢復軍事強國的目標也是非常的明顯。這兩大強國的實力結合起來確實相當可觀。新現實主義憂心展現，新自由主義者則認為 21 世紀的國際關係在全球化的大結構之下，足以塑造有形和無形的約束，讓新崛起的中國和俄羅斯有足夠的誘因改變舊有的富國強兵思想成為和平睦鄰的政策。<sup>21</sup>

全球化所帶來的結構性改變無庸置疑。資訊化、網路化、商業化、產業化都是有目共睹的大趨勢。從最根本的國際關係立足點就可以看到新典範的最核心思想，它是以合作來取代長達數千年的國際鐵則——以對抗和戰爭來改變秩序或維持秩序。由此而生的是多邊主義、多邊外交，加上國際體制的倡導，制度主義於是成為大家共同追求的目標。由於新自由主義者相信和平是可以培養和塑造出來的，伴隨這個理念而來的政治、經濟、軍事方面的想法和作法就相當具有創意及創新。

新自由主義和新現實主義的重疊是不可避免的。在實際的外交政策上，我們可以看到許多政策融合了兩種典範。而後冷戰時期嶄露頭角的社會建構論的最初構想就是想擔任新現實和新自由主義之間的知識橋樑。<sup>22</sup>這個構想到今天還在努力之中，能否成功無法斷言，以今天國際關係的理論之多，要去連接新自由主義和新現實主義是相當困難。加上社會建構論本身

---

2005).

<sup>21</sup> Andrew Moravcsik, "A Libera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51, No. 4(Autumn 1997), pp. 513-554. ; Paul Starr, *Freedom's Power: The True Force of Liberalism* (New York: Basic Books, 2007).

<sup>22</sup> Iver Neumann and Ole Waever, *The Futur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London: Routledge, 1997), pp. 269-289.

的發展，它的社會學特質愈來愈明顯，由於他對於本體論及認識論的強調，這和新自由主義或新現實主義的學門基礎就有很大的區別。因此，社會建構論很自然就成為單獨的典範，而它在學術上的影響力自然逐漸擴散和增強。但是在實際的外交政策上，社會建構論不如新現實主義化新自由主義，它的論述可以幫助西方國家的領導人了解國際關係，在決定國家戰略或外交政策時，卻被忽略。究其原因，社會建構論的學術性過高，與現實政治距離太遠，難免曲高和寡。很有趣的現象是，有些國家領導人在制定外交政策或籌設某種國際論壇之時，不知道他們正在引用社會建構論的見解，等到以後學者提出說明之後，他們才了解到已經把社會建構論付之實現，東南亞國協本身就是例子之一。<sup>23</sup>

需要特別強調的是，典範的使用並不普遍。大多數的學者還是喜歡使用理論或學派，因為它們清楚、易懂。國際關係的研究和外交政策制定受到傳統哲學思考還是很強，即使在美國也是如此。很多的政策都是反應出美國的政治理念或歷史經驗，不去了解這些背景實在無法明白當前的美國外交政策或國家安全戰略。典範的使用只是幫助我們去梳理各種不同的理論，借用自然科學的研究方法來研究社會科學而已。至於是否採用完全看每位研究者自己的判斷。社會科學本來就有它的多元性和歧異性，國際關係更是如此，今天要使用三種典範來涵蓋所有理論當然是做不到的。典範的使用代表這一種科學的態度，秉持這個態度就是做好研究的起點。

其次，三種典範之間並非互相排斥。我們觀察主要強國的外交政策可以發現，自由主義和現實主義往往是並存的，而且是交換採用。<sup>24</sup>即使自由和現實主義的新舊之分也是學術的意義重於政策的意義。外交決策者並不區別新舊之分，對他們來說，如何維護國家利益和解決政策難題遠比學

---

<sup>23</sup> Amitav Acharya, *Constructing A Security Community in Southeast Asia* (London: Routledge, 2008).

<sup>24</sup> Peter Katzenstein and Nubuo Okawara, "Japan, Asian-Pacific Security, and the Case for Analytical Eclecticism,"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6, No. 3(Winter 2001-2002), pp. 153-185. 更完整的說明分別參閱 Robert Keohane ed., *Neorealism and Its Critic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6). 及 David Baldwin ed., *Neorealism and Neoliberalism*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3).

術的辯論更重要。至於三種典範是否能整合成為一種典範？以社會科學的本質來判斷，這種可能性是不存在的。

最後，典範的使用往往是學術的考量超過政策的爭辯。<sup>25</sup>當然，國際社會出現新的問題會導引出新的理論，但從過去社會科學的發展來看，典範往往先出現在知識社群，他們通常為了解決人類的問題。就等於醫學或物理的研究，必然是針對臨床或人類社會的需要是一樣的。可是在研究過程中，往往會有意外的發現，用來解決其他困擾人類長期存在的問題，醫藥就是如此，物理也是如此，國際關係也沒有例外。

需要特別強調的是，現實主義、自由主義和社會建構論用來解釋和分析國際政治可以相輔相成，而且有相當的代表性。可是，國際政治只是國際關係的一部分而已，國際安全、國際政治經濟、外交政策、國際組織和國際法也都構成國際關係的重要部份，要使用這三種典範去涵蓋已經是不可能。在國際安全的領域，現實主義、自由主義和社會建構論還是可以作為主要的典範，可是傳統的軍事科學或戰略研究確實需要加列進去，成為四大典範。若以軍事科學而論，戰略、戰役、戰術、武器、後勤和指揮體系成為必要的研究項目，要使用三大典範去涵蓋也是不可能。尤其在資訊化的後冷戰時期，軍事轉型已經超越了三大典範的範圍，要去了解它的內容及影響就需要借助於軍事科學自己的理論架構。而處理和分析一連串的非傳統安全議題一樣是要求助於不同的學科。<sup>26</sup>氣候變遷在可見的未來必然是國家安全的重要研究議題，能源、疾病、衛生醫療、糧食、人口、環境污染、移民、資源保護等都是影響到國際安全的重大問題，而核武擴散、武器管制、衝突預防及解決一樣不是三大典範可以提供完整的答案。以前他們或許還可以應付，將來就更為困難。<sup>27</sup>

<sup>25</sup> 黃光國，*社會科學的理路*(台北：心理，2001年)，頁159-182。

<sup>26</sup> 非傳統安全已經成為一個新的安全研究項目，愈來愈受到國際社會及主要國家的重視，最基本的入門書籍是 Michael Brown et al., *New Global Danger, op. cit.*

<sup>27</sup> 未來的國際關係可能只能維持一個領域，至於理論或模式的多元化是不可避免，現在已經是如此。國際安全由國際關係分出來，可是國際安全又分成國家安全、區域安全及全球安全，甚至於整個安全研究的理論架構都已經形成。這些要依靠單一的典範作為研究的基礎是不可能的。

國際政治經濟的領域也是面臨相同的挑戰。由於國際政治經濟強調市場、貿易、金融和投資，傳統以政治為核心的研究典範自然不適用。可是，以國家為基本成員的政治經濟行為或決策，三大典範還是可以使用，只不過現實主義和自由主義要加上足夠的國際貿易、國際分工和投資理論，才能了解國際政治經濟學的變化和未來發展。社會建構論則被廣泛的用來解釋地區的經濟整合，為歐盟、東協，甚至於亞太經合會及北美自由貿易區開拓了一個嶄新的解釋面向。傳統的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或世界體系理論，還是相當重要，而且具有很高的啟發性。在全球化的今天，馬克思沒有被遺忘，也不會被遺忘。<sup>28</sup>

外交及外交政策一直是國際關係很重要的一部分，長期以來就有自己的典範。當然，現實主義一直是基本的典範，而且是最主要的典範。國家利益的界定、引用和解釋幾乎是根據現實主義，最近加上自由主義和社會建構論。不過，外交本身無法完全使用三大典範去了解，談判、溝通、外交制度、決策過程和執行依靠其他的典範，很多和溝通理論、決策理論和國際法是脫離不了關係。而外交政策愈來愈和公共、國防、經濟政策相結合。台灣的外交又和兩岸關係不可分，這是其他國家沒有的特殊政策連接 (policy linkage) 關係。總的來看，外交政策和企業政策關係愈來愈密切，而公共管理也進入外交決策的領域。外交決策要去研究和學習治理、管理、處理和綜理，也就是一般通稱的政策科學。<sup>29</sup>

國際組織和國際法則是完全不同的領域。組織和法律在理想主義或自由主義中可以找到解釋的空間，可是國際組織的功能和國際法的成長要從它們各自的領域中去尋根，然後提出科學化的解釋。法理哲學、法學概念和判例的解釋並不是自由主義可以涵蓋的範圍，現實主義更做不到，社會

---

<sup>28</sup> 不僅是了解前社會主義國家的外交政策，單就社會學或社會科學的研究而言，馬克思思想還是有必要研究的。參閱 George Ritzer and Douglas Goodman, *Sociological Theory* (New York: Macmillan, 2003).

<sup>29</sup> George Berkley and John Rouse, *The Craft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New York: McGraw-Hill, 2004). ; Owen Hughes, *Public Management and Administration: An Introduction* (London: Macmillan, 2003).

建構論只能提出輔助性的說明，但作用是相當有限。<sup>30</sup>

不論國際關係的分工是如何的細緻，政治還是核心，這在可見的將來不會改變。而人類的政治在經歷數千年的文明衝擊之下，它還是有永恆不變的本質，那就是權力的取得、使用和維護。這是柏拉圖、馬克維里、韓非子、孔子和太多政治先哲所費心思考的問題，也是他們提出的最基本治理、管理、處理和綜理國家大事的無窮智慧。擺在今天的國際大環境之下，現實主義、自由主義和社會建構論還是有它們獨到之處。只是國際關係對於文明、文化及發展愈來愈重視的大趨勢之下，社會建構論的成長是不可避免的，它的重要性也會逐漸的提升。

### 參、現實主義

現實主義是人類開始有政治思想以來，一直是最有影響力的理論，中西都是如此。在最初，它不是以現實主義來稱呼，但以後研究中西政治思想史的學者發現這種歷史的脈絡，到今天還是如此。西方學者推崇馬克維里(Niccolo Machiavelli)，中國則以韓非子為代表。可是，馬克維里在西方政治學界或實際政治的歷史中，所受到的尊榮顯然遠遠超過韓非子。韓非子的影響在於中國的封建統治，主要原因是該書所強調的是，君王應該利用權術、法律及勢力來統治國家，而其最根本的核心就是在維護皇權。秦朝是奉行法家思想的朝代，到了漢朝之後，由於尊孔奉儒的結果，韓非子的思想自然受到排斥。但在現實政治中，韓非子所描述的卻為君王所喜愛。至於在中國的對外關係方面，韓非子及其他的著作所發揮的影響力就非常有限。歷代中國君王日夜苦思的是如何讓帝國長治久安，並沒有預見會遭遇到一個類似歐洲多國相互競爭的國際環境。在他們的理念中，中華文明籠罩的天下就是他們統治的領域，其他的是化外之地，從來就沒有所謂的

<sup>30</sup> 「全球治理」會討論到國際法及國際組織，但使用自由主義的典範，最好的例子是 Robert Keohane, *Power and Governance in a Partially Globalized World* (London: Routledge, 2002); Lisa Martin ed., *Global Governance* (London: Ashgate, 2008).

對等的國與國關係，更談不上建立一套國際制度或法律。國際法引進中國是清朝的事，1842 年簽訂的南京條約使中華民族的尊嚴受創，也象徵中華文明為中心的朝貢體系的結束。<sup>31</sup>

兩岸的國際關係研究及教學所使用的現實主義教材完全來自西方國家，這也是情勢使然。從馬克維里開始，加上霍布斯(Thomas Hobbes)、史賓諾沙(Baruch Spinoza)，近代的威特(Martin Wight)和卡爾(E. H. Carr)，現實主義就成為國際關係的最主要典範，而總其大成，把它擺在整個國際體系上去解釋和分析國際關係的是墨根索(Hans Morgenthau)，他幾乎成為現實主義的宗師，而影響力到今天還是存在。<sup>32</sup>他的主要著作--「國家間的政治」(Politics Among Nations)還是經常被使用，雖然許多史料和觀念已經和 21 世紀的資訊時代不符。早期兩岸的國際關係教材大都是根據墨根索的著作加以引伸或解釋。現實主義對西方國家或兩岸的國際關係研究及教學的影響是很深的。

現實主義的基礎建立在無政府的國際社會這個最根本的認知，於是國家為了自保，只有儘可能壯大自己，弱化敵人或對手。這並不時過於新奇的見解，從太多的政治思想的著作中都可以找到這樣的見解。現實主義所強調的是一種研究的態度、政治的風範和外交的準則，及面對和接受權力的現實，不要以過於理想的期待和目標，去處理人類的政治。有些政治是人類智慧及客觀環境可以去改變的，有些則沒有可能。面對和接受是一種必要的選擇。從 1648 年開始，歐洲外交所展現的就是這種政治傳統，而維護國際秩序的最大因素是各國的力量，其中又以軍力為主要的憑藉。國際法當然有它的作用，但它畢竟是附屬在國際政治之下的一套規則而已，關鍵性的因素還是政治的運作。

馬克維里和霍布斯的著作幾乎是各國領導人的理念泉源。以後的學者只不過是加以整理和闡述而已，墨根索是最佳的代表，他的著作正好和第

<sup>31</sup> 王正毅、張岩貴，*國際政治經濟學*(北京：商務印書館，2003 年)。

<sup>32</sup> 受到墨根索影響最深的是 Inis Claude, *Power and International Affairs*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62) ; George Kennan, *Realities of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Princeton,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54)。



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美國成為世界超強、扮演世界警察的角色一起問世，它的說理和分析是歐洲外交的延續，當然更是現實主義的最豐富闡述。正因為如此，初學者一定要把歐洲外交史或 1648 年之後的歐洲國際關係弄清楚，否則他的著作並不容易看得懂。<sup>33</sup>將這長達三百年的國際政治放在現實主義的概念架構之下並不是容易的事。他把歐洲外交裡頭的哲學、政治和戰略用追求權力、使用權力和擴張權力來解釋，今天看來並不完全正確。歷史上的歐洲國家不少有「韜光養晦」的時期，為的是儲備力量再圖興起，可是，現實主義所描繪的歐洲外交和實際的運作相差不遠。它的根本是一個零合、競爭和互相抗衡的國際政治。它絕不是一家之作，而是融合了歐洲各國的政治思想家的見解而形成的共同見解和政策。

今天還釋有很多學者重新解釋培羅奔尼撒戰爭和西索底斯(Thucydides)的理論，或馬克維里、霍布斯及盧梭。嚴格來說，作為二十一世紀或更長遠未來國際關係的研究，這些思想史的重新研究自然有其價值。為一個長達數世紀的國際關係提出解釋，墨根索只能說是做好奠基的工作。為使得研究更為周嚴，認識更為完整，下列五本著作應該要參考：

- (1) 艾宏(Raymond Aron)的「和平與戰爭」(Power and War)
- (2) 布爾(Hedley Bull)的「無政府社會」(The Anarchical Society)
- (3) 克勞德(Inis Claude)的「權力及國際關係」(Power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 (4) 沃特(Stephen Walt)的「聯盟的起源」(The Origin of Alliances)
- (5) 吉爾平(Robert Gilpin)的「世界政治的戰爭與改變」(War and Change in World Politics)

前面兩本書是讓讀者了解英法兩國對於現實主義的解釋。有人或許會認為卡爾(E. H. Carr)的「二十年的危機」或許可以能更周全說明英國學派對現實主義的看法。不過卡爾的著作出版過早，要來解釋今天的國際關係恐怕不合適。而克勞德及沃特兩人都在權力平衡上做了完整的分析，這是

<sup>33</sup> K. J. Holsti, *Peace and War: Armed Conflicts and International Order, 1648-1989*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1). ; Tony Judt, *Dust War: A History of Europe Since 1945* (New York: Penguin, 2005).

墨根索不足之處。尤其沃特以「威脅的平衡」來說明國家在遇見安全上的威脅之時，一定會走向權力平衡，組成不同的聯盟體系，是墨根索很好的補充。<sup>34</sup>綜合來說，現實主義者的共同主張是，人性本惡決定政治行為，詐欺、權謀和爭奪是不可避免，國際社會的無政府狀態製造的國際關係的本質，即戰爭不可能消失，而且成為決定國際關係的重大因素。外交被用來防止戰爭或贏得戰爭。現實主義不是最完美的政治哲學，它只不過是面對人類政治的真實本質所提出的務實方法而已。它是一個態度，也是一種主張，更是一種有長久歷史的意識形態。它絕不是西方國家特有，在中國、日本和其他亞洲國家也有太多的現實主義者，只是在國際關係的研究教學上，墨根索的著作成為大家共同使用的教材。

由於現實主義者太多，學界自然加以分類，也要做出選擇。<sup>35</sup>墨根索的著作即使有它的代表性，今天已經有不少人捨棄，而使用更新的著作。或者說，摩根索的著作已經成為國際關係史的主要參考著作，而要了解21世紀的國際關係就要去鑽研新現實主義。當然，新舊現實主義有太多的持續性和連貫性，要完全切割是很困難的。更何況，新現實主義要取代舊現實主義也是做不到。在可見的未來，新舊現實主義併存是很自然的結果，這會增加學習者和決策者的負擔，因為他們所要閱讀的著作必然增加，而且理論也會更加複雜。

華滋(Kenneth Waltz)在1979年出版的「國際政治理論」(*The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被認為是新現實主義的先導。要特別說明的是，華滋在出版這本書之前，西方國家的國際關係已經經過了很長的辯論及實際政治的檢驗。在學術研究上，強調社會科學化的國際關係已經是學界的共識，華滋只不過將它付諸實現。其次，在國際政治上，越戰、美蘇和解、美中關係正常化、歐洲整合和第三世界國家的困境，使得國際關係傳統理論的適用性受到質疑。這些經驗在歐洲外交史上是從未發生或未曾預料到的問題，過去的理论就無法適用。當然，美蘇中所建立的戰略三角關係絕對可

<sup>34</sup> Stephen Walt, *The Origin of Alliances* (Ithaca, New York: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7).

<sup>35</sup> 參考 Michael W. Doyle, *Ways of War and Peace* (New York: Norton, 1997), pp. 41-195.

以利用歐洲外交史上的戰略或聯盟來解釋，可是核子時代的戰略三角關係畢竟和傳統武器時代的聯盟關係有根本上的差異。

華滋繼承了墨根索留下來的無政府國際社會的大架構去思索新現實主義。他的著作展現了下列的特點：(1)他擺脫了墨根索的歷史研究途徑，很少使用歷史事實，完全使用說理和演譯的方法去推論出國際政治的基本理論。(2)引用了社會科學的實證主義，希望使用和參考自然科學的途徑，為國際政治建立通則。所以他的書很簡要，讀起來就像是國際關係的普通物理、微積分或基礎生物一樣，充滿許多經過簡化而成的通則，但對於歐洲外交上的戰爭或重大外交爭論卻很少提及，即使影響到國際關係很深遠的第一、第二次世界大戰和冷戰的起因、結果和影響，他也是沒有討論。從這裡來看，華滋的著作可以說是一本革命性的專書，正因為如此，他的學術地位就屹立不搖。(3)大量的採用普通物理、經濟學和一般體系理論，特別是公司、個人的交易和經營行為，來說明國家在國際社會中如何自保。(4)為他自己所一貫推崇的兩元國際體系作出更詳細的說明，並再度的強調這是國際政治上最佳的體系，不但容易操作、維持，而且不會引發戰爭。即使有衝突或小型戰爭，也很容易可以掌控或處理。(5)使用結構和單元去分析國家在無政府的社會中如何去保護自己，為自己爭取到最大的利益。

華滋的著作出版之後，受到的批評相當多，主要集中在社會科學方法論上的爭議。<sup>36</sup>作為研究與教學，這些爭議的釐清是必要的。首先，最大的爭議在於華滋廣泛的使用實證主義的社會科學研究法是否真正的能夠了解國際關係的本質，他很明顯的把國際關係和歷史、政治切割。在建立通則上，他毫無疑問是成功的，可是排除了歷史和政治，特別是現實主義在長達千年以上的權力分析，這種研究方法已經偏離了國際關係的核心。其次，華滋在使用國際經濟學或社會學上採用了比擬的方法，這在社會科學的研究上一向是最受質疑的。比擬並不是科學化的研究，它可以幫助了解，可是作為嚴謹的科學研究，它的證明和解釋有待加強。再其次，華滋

---

<sup>36</sup> 最主要的代表著作是 Robert Keohane, ed., *Neo-realism and Its Critics*, op. cit.

在分析過程中，很明顯的對於人類的功利主義或理性主義有高度的信心，這當然是現實主義長期以來的最基本假設，把它視為是華滋的缺失並不公平。最後，華滋所說的單元事實上就是國家，而他所說的結構和國際社會也是相差不遠。如果是如此，華滋很顯然把國際關係過份的簡化，因為今天的國際關係已經不再是完全由國家主導，而國際社會的變化一樣是既快速、又複雜。

儘管如此，華滋的「國際政治理論」一書奠定了他在學術上的領導地位，這是無庸置疑的。<sup>37</sup>最主要的原因是他把國際關係從傳統的窠臼中跳脫出來，走向科學一體化的方向，這是很不容易的事。他的研究成果固然有待改進，可是批評總是比較容易，要真正的做到國際關係的社會科學化非要有知識社群的共同努力不可。華滋在這個大方向上已經邁出了一大步，他的成就在此，而他的著作會一再的被引用，甚至做為基本的教材不是沒有道理。華滋沒有預想到十年之後，冷戰竟然結束，而他所推崇的兩元體系一樣宣告結束。冷戰結束對於現實主義造成的衝擊，如同排山倒海，一直到2000年之後才逐漸平息下來，新現實主義總算又站穩腳步。

新現實主義再恢復它往日的光彩有很多的原因。一是早期對於後冷戰時期的和平期待確實過高，國際政治的現實證明和平要比戰爭更為困難，於是，現實主義又回到原來的主流地位。二是在同時期之間，國際關係學界對於新現實主義的研究並沒有停止，更多的著作相繼問世，其中又以墨斯麥爾(John Mearsheimer)的「大國政治的悲劇」一書最具代表性。<sup>38</sup>這本書奠定了墨斯麥爾作為新一代現實主義大師的地位，幾乎和華滋並駕齊驅。

為什麼墨斯麥爾的著作會受到如此的重視？<sup>39</sup>從整個國際大環境來看，冷戰結束所帶來的期待逐漸冷卻之後，留下來的一連串問題讓大國，

---

<sup>37</sup> Iver B Neumann and Ole Waever, eds., *The Futur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London: Routledge, 1997), pp. 66-89.

<sup>38</sup> John J. Mearsheimer, *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 (New York: Norton, 2001).

<sup>39</sup> 參閱 Richard Rosecrance, "War and Peace," *World Politics*, Vol. 55, No. 1 (October 2002), pp. 137-66.

特別是美國，苦思對策。於是，各式各樣的主張出現，新自由主義或新制度主義在先，社會建構論幾乎是同時，伴隨而來的是許多的批判性理論，稱這段時期為國際關係的百家爭鳴一點都不為過。最主要的是一種新的體認，現有的國際關係知識如果不重新解構，對於快速變化的國際社會當然找不出解決的方法。既存的知識一定要重新檢驗，新的觀點和態度決定新的研究方法，國際體系既然已經重新建構，知識社群一樣要很深刻的反思。

在這個反思過程中，華滋的著作並沒有被否定。他沒有預測到冷戰的結束，但這絕非是他的缺失。事實上，幾乎沒有一位頂尖的國際關係學者預測到德國統一、東歐鉅變和前蘇聯的解體，更不用說冷戰的結束。反過來看，華滋的成就在於他的國際關係社會科學化，沒有他奠下的基礎，後冷戰時期的反思就無從做起。總體而言，國際關係對於認識論和本體論這些最基本的科學哲學問題進行討論，無政府國際社會和權力等既有的概念都重新界定，而太多的觀點也進行檢驗，它幾乎是一次國際關係的科學革命。在這些著作之中，最值得參閱的是賈維茲(Robert Jervis)的「系統效應—政治與社會生活中的複雜性」。<sup>40</sup>這本書被認為是繼華滋的「國際政治理論」之後，在理論上提出強有力的補充。賈維茲對華滋的「國際政治理論」提出了批評，然後使用系統理論做了修正，嚴格說來只是對墨根索以來的現實主義提出補充的意見，他的作法和早期的卡普蘭(Morton Kaplan)非常類似。卡普蘭對於國際體系的分析曾經名躁一時，但墨根索的著作還是被認為經典之作。賈維茲的「系統效應」也是有相同的效果及評價。至於新自由主義和社會建構論則容後再述。

相形比較之下，墨斯麥爾的「大國政治悲劇」就得到更多的重視，原因不但是他討論到「中國威脅」這個在美國外交上最關鍵的問題，而且是他幾乎繼承了從卡爾、墨根索、布爾及季辛吉以來的現實主義大師的主張，完全從最傳統的權力政治角度去重新分析國際關係最根本的問題，也就是

---

<sup>40</sup> Robert Jervis, *System Effects: Complexity in Political and Social Life* (Princeton,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7).

大國如何相處、世界秩序如何維持。他的著作並不是辯論的總結，只是代表西方學界的一種詮釋，而他的詮釋被認為是比較突出，將來還是會有更多的著作來修正、補充，甚至推翻他的見解。

回顧長期歷史的現實主義著作，我們可以發現兩種主要的差異。一是古典的現實主義，最好的代表就是馬克維里，他一再強調國家或君王最應該重視的就是權力。韓非子也是持相同的見解。另外則是結構型的現實主義，最好的代表就是霍布斯，他強調叢林社會的弱肉強食狀態，國家要特別注意的是安全。這樣的區別在早期並沒有吸引學者的注意。一直到新現實主義出現之後，大家才明白這種立論上的差別。華滋持這樣的看法，墨斯麥爾也是相同。而墨根索則比較重視權力，這是非常明顯的。這樣的區分是否必要？在後冷戰時期的發展，我們了解到安全變得更為急迫，但同樣的，安全的威脅也變得更為多樣，而國家能夠掌握的資源或資訊往往是不足的。所以，了解到安全的迫切性和資源的稀缺性是必要的。同理，以往對於權力的界定限於軍事力量，以後又擴及到經濟力量。不過軟性力量和智慧型力量的出現卻是後冷戰時期的特點，將來還會有更大的發展空間。

其次，我們從墨根索以來的著作得到一個很肯定的見解，即國家在面臨安全威脅時，必然走向權力平衡。事實完全是如此嗎？墨根索並沒有回答這個問題，可是中外歷史有太多的扈從例子，也就是弱國在面臨強國的威脅之時，求和但不委屈是常見，而且被認為是必要的。墨斯麥爾就提出「棄而不顧」(Buck-passing)這樣的策略來描述國家不一定只有走向權力平衡一途。而其他的學者也主張扈從(bandwagoning)要比平衡的風險較低，如果沒有其他的強國可以用來牽制主要的威脅國之時，採用這種策略是常見的選擇。<sup>41</sup>這個時候，考慮的就是利益的平衡(balance of interest)，而不只是權力的平衡。

墨斯麥爾的著作之所以會受到如此的注意，最根本的原因是他成為

---

<sup>41</sup> 參見大國政治的悲劇，前引書，第八章。批評的意見參考 Richard Rosecrance, "War and Peace," *World Politics*, No. 55, No. 1(October 2002), pp. 137-166.

「攻擊型現實主義」的代表。這也是後冷戰之後，現實主義的最主要區別所在。這種理論上的差異幾乎是歐洲的情勢帶給學界的反思和檢驗。墨斯麥爾在出版「大國政治的悲劇」之前，就以一篇「回到未來」(Back to the Future)的論文，預測德國將走向核武而震驚了學界及政界。<sup>42</sup>以後的發展證明這種預言過於聳動，但他成為「攻擊型現實主義」的代表在「大國政治的悲劇」上市之後，就奠定下來。

和「攻擊型現實主義」相對應的是「防衛型現實主義」，兩派意見的差異很容易了解。<sup>43</sup>前者認為國家處於無政府的國際社會，除了富國強兵、壯大自己、建立霸權之外，並無其他選擇。於是據地練兵和廣積財富是絕對必要。早期是陸軍為重，以後則是海軍，現在是核武成為強國必要的選擇。「攻擊型現實主義」並不因為如此而主張窮兵黷武，相反的，他們認為國家應該要仔細盤算，為戰爭作最妥善的準備。正因為如此，墨斯麥爾對美國出兵伊拉克持強烈反對意見。把新現實主義和新保守主義劃上等號更是不正確，雖然在強調國家在外交和國際上採取積極作為，雙方是有共同的想法。可是，新現實主義並不是新保守主義，做好這個區分是很重要的。

「防衛型現實主義」則採更為樂觀的見解，這受到後冷戰時期歐洲和平的影響是很大的。他們接受無政府國際社會的現實，可是主張國家所面對的安全稀缺性和危險性雖然過度誇張，國際社會有太多的限制來阻止國家發動戰爭，而歐洲的共同行為典範、經濟整合、武器管制、一連串的信心建立措施、以和平方法解決爭端，證明了「防衛型現實主義」是比較合乎實際的現狀。另外更為折衷的見解則強調在無政府的國際社會中，國家間的相對性、連動性維持資訊時代的國際秩序，既合作又有競爭，中國不必然是美國的威脅，當然美國也不一定處處為難中國，完全要看問題的性

---

<sup>42</sup> John Mearsheimer, "Back to the Future: Instability in Europe After the Cold Wa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15, No. 1(Summer 1990), pp. 7-57.

<sup>43</sup> Randall Schweller, "Bandwagoing for Profit: Bringing the Revisionist State Back in," *International Security*, No. 19, No. 1(Summer 1994), pp. 72-107. ; Glenn Snyder, "Mearsheimer's World-Offensive Realism and the Struggle for Security: A Review Wssay,"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7(Summer 2002).

質而定。我們把這種折衷的見解稱之為「新古典現實主義」。

現實主義最受人激賞之處在於它掌控到人類政治的根本核心，也就是權力。沒有權力的政治，不管是國內或國際，都是空虛的。國家之所以成為強國，領導人之所以成為領導，就是他們擁有權力，而且知道如何善用權力。現實主義新舊之分，或者是攻擊型、防衛型及新古典學派都是反映出國際社會的改變，其中最重要的是人類文明快速進步之後，國家間政治行為的變化。人類不可能停止思考，國家更不可能停滯不前，國際社會一樣是不斷在演進。不變的是，科技再進步、武器再精準、國家再富有，權力永遠是政治的最原始動力。在這個基礎上，現實主義的地位不會動搖，不管它有多少的分支學派。

## 肆、自由主義

從現實主義進到自由主義彷彿走入另外一個知識的世界，看法與主張完全不同，頓時之間悲觀改成了樂觀、爭奪變成了合作、猜疑變成了信任、戰爭的準備變成了和平的期待。連最基本人性的看法也由本惡變成了本善。這是政治思想史上的常態，也是人類處理政治問題的一貫態度。<sup>44</sup>從韓非子、商鞅和管子進到孔孟學說得到的是相同的感受。在數千年以上的人類政治史上，自由主義或理想主義一直都是主導政治思想的一大主流，到今天還是如此。從柏拉圖、亞里斯多德、洛克、邊沁、穆勒、康德，到當代的湯恩比、羅素和杭亭頓，是一脈相傳的政治學，當然各家還是有不同的主張。相形比較之下，理想主義或自由主義的氣勢較弱，這是歷史造成，因為外交史本來就充滿各種政治角力，和自由主義所描述的世界相差甚遠。另外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則是，國際關係一開始成為社會科學的分支學科之時，以卡爾為首的現實主義先聲奪人，再加上墨根索隨後跟進，整個國際關係學界幾乎成為現實主義的天下。

---

<sup>44</sup> 最有代表性的著作還是鄒文海及浦薛鳳兩人撰寫的**西洋政治思想史**。



以上所言並非表示理想主義在內容上居於劣勢。相反的，不論是質或量的比較，早期的理想主義和以後的自由主義絕對不比現實主義遜色，而且涵蓋的範圍更廣，討論的議題更多。<sup>45</sup>和馬克維里一樣，康德被認為是自由主義的宗師，影響力到今天依然到處可見。洛克和邊沁也是如此。這也就是社會建構論會使用霍布斯文化、洛克文化和康德文化來解釋國際關係的基本原因。他們重視人性的善良、政府的效能、人民主權、國際合作及法治，和馬克維里確實有不同。在政治權力這個最基本問題上，康德和洛克並不排斥，而是主張用善誘、規則和良治去建立秩序，而不是使用控制、武力和霸權來維持秩序。這樣的主張和國際政治的本質未免曲高和寡，可是他們展現的積極意義是不能輕易忽略。這是長期以來，政治思想家重哲君、倡修身及講倫理的道理所在。

理想主義不容輕忽的另一個原因是，它和國際法一起成長，在維護國際和平和秩序上有它不可磨滅的貢獻。歐洲的國際政治始於 1648 年，但國際法的研究起源更早。格老秀斯(Hugo Grotius)是大家熟知的學者，但以後在歐洲推廣國際法則不乏無數俊彥。現實主義倡行之同時，歐洲國家認為法律是各國必須共同遵守的原則，否則條約不必遵守，國際關係如何運作？權力平衡、戰爭和擴充領土確有必要，法律做為最基本的共同行為準則，一樣是不可缺少。有趣的是在各國準備贏得戰爭之際，最早的國際法竟然是為了解決俘虜的待遇而產生。以後康德特別強調法律的重要性，認為世界政府若能成立，國際和平應當可以維持，基於相同的立論為基礎。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後，西方學界有感於戰爭的可怕，決心把國際關係納入大學教育之時，國際法已經有相當紮實的基礎。1919 年之後的二十年，國際關係幾乎是國際法和理想主義的天下，大家所期待的是世界政府和集體安全，雖然它是卡爾所描述的烏托邦的想法。

毫無疑問，美國的威爾遜總統(Woodrow Wilson)是當時最典型的理想

---

<sup>45</sup> 這種情況在威爾斯大學為慶祝國際政治系成立五十週年所出版的專輯中有很詳細的說明，見 Brian Porter ed., *International Politics, 1919-1969*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2).

主義者，他的主張及理想到今天還有影響力。<sup>46</sup>事實上，美國布希總統所信仰的新保守主義中，有些是繼承了威爾遜總統的想法。威爾遜所支持的國際聯盟最後走上失敗之途，美國始終沒有參加，但第二次大戰結束之後，美國率先籌組了聯合國，等於威爾遜的理念付諸實現。隨後的冷戰使得聯合國的運作遭遇無法克服的政治困難，理想主義被迫向現實主義妥協。權力政治成為主流，集體安全再度成為烏托邦的理想。

在冷戰時期，自由主義確實失去了學術的主導和政策的訴求。國家安全成為強國最重視的議題，學術研究和政策制定就以此為核心。在美國倡導圍堵政策之餘，前蘇聯追求共產主義的世界革命，要防止這種逆流就要依靠強大的軍事力量，現實主義之受到重視是預期之中。<sup>47</sup>除了國際法之外，自由主義所重視的合作型國際關係只能在西歐找到它落實的園地。梅傳尼(David Mitrany)的功能主義成為解釋歐洲共同市場成立的最主要依據，也是第二次大戰結束之後，自由主義的代表。<sup>48</sup>地區整合在當時才剛開始，可是已經為冷戰所帶來的國際緊張情勢帶來新的期待。就連以後自由主義的另外一位大師—奈伊(Joseph Nye)，也是以研究東非的地區整合起家。很可惜的是，東非並沒有成為另外一個西歐，雖然英國統治過的肯亞、烏干達和坦桑尼亞確實有整合的基礎。

自由主義以哈佛為基地，以西歐為研究對象，經濟整合和安全社群成為二大領域，前者孕育了功能主義和新功能主義，而後者則導引出安全及和平研究的理論，對於衝突預防和解決、人類安全以及預防外交等都有促進的作用，即使社會建構論一樣收到相輔相成的效益。當年的美蘇和解、以後的歐洲和平，同樣受惠於最初的研究，而今天的東協區域論壇

---

<sup>46</sup> John Milton Copper ed., *Reconsidering Woodrow Wilson* (Baltimore, Maryland: John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2007). ; G. John Ikenberry et al., eds., *The Crisis of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Wilsonism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Princeton,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7).

<sup>47</sup> Hans Morgenthau 的書受到如此歡迎及重視就是最好的說明，現實主義的影響力可以說決定了冷戰時期的主要強國的外交政策，即使中小型國家也受到不同程度的影響。

<sup>48</sup> David Mitrany, *A Working Peace System* (London: Royal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1943). 這本書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前出版，可是以後成為研究功能主義必讀之佳作。

(ASEAN Regional Forum, ARF)和一系列的亞太安全對話一樣是從這些研究中的到啟發。將來如果兩岸能簽訂和平協議，構建了兩岸安全社群或共同體，也是可以從這些早期的理論中得到佐證。功能主義和新功能主義不但為歐洲整合找到理論的基礎，非洲、拉丁美洲、亞太以及加勒比海的各種地區整合一樣使用這兩種理論來解釋。從 1987 年開始推動的兩岸關係參考功能和新功能主義之處甚多。

梅傳尼和其他學者的理論已有很多的說明，在此不再贅述。冷戰時期的自由主義對於歐洲整合、聯合國、關稅及貿易總協定、國際貨幣基金、世界銀行和其他的功能性國際組織寄予厚望，普遍認為這是世界和平及繁榮的有力催生者。非僅如此，非洲國家在六〇年代紛紛獨立，許多自由主義學者認為新興國家只要效法西方國家，必然走向現代化的道路，問題只是要花多少時間才能進入已開發國家之林。它確實是樂觀的年代，以後因為越戰失利，美國人權運動興起，加上大社會計畫無疾而終，新興國家的動亂，自由主義把注意力集中到西歐、美國及日本的三邊關係之上，美元及隨後的金融危機讓工業國家體認到，經濟的問題還要比政治或軍事問題更為迫切。

這時的自由主義學派有兩本最基本的著作。一是陶意志(Karl Deutsch)的「國際關係的分析」，二是奈伊及克歐亨(Robert Keohane)合寫的「權力和國際互賴」。<sup>49</sup>前者是西方社會科學強調行為科學之時的代表著作，要比華滋更早提出科學一體化的想法來研究國際關係，而後者則是自由主義的國際關係基本教材，地位和墨根索的「國家間政治」相當。陶意志和奈伊及克歐亨的專書一樣已有詳細的介紹，而且翻譯成為中文，兩岸學者對他們並不陌生。綜合功能主義、新功能主義、安全社群及國際互賴，這些被稱為國際關係的自由主義。他們的見解和現實主義有重疊之處，即接受國際社會無政府、國家為國際關係基本成員、國家依照利益制定外交政策等基本要素，但是在國家互動、利益的本質和維持國際秩序的方法上有

---

<sup>49</sup> 奈伊及克歐亨的著作遠比陶意志的書受到重視，幾乎被認定是「國家間政治」的另外一種研究途徑的教科書，影響力一樣相當深遠。

明顯的差別。從 1980 年代開始，新自由主義逐漸成型，到了冷戰結束之後，新自由主義就成為風行的典範，前後大約有二十年的時間。所以要了解自由主義作為國際關係的典範，一定要閱讀梅傳尼、陶意志及奈伊和克歐亨的專書。此外，為求得更週延的認識，還必須參考：

- (1) 羅斯陶(W. W. Rostow)的「經濟成長的階段」(The Stages of Economic Growth)
- (2) 杭亭頓(Samuel Huntington)的「變遷社會的政治秩序」(Political Order in Changing Societies)
- (3) 派伸斯和席爾思(Talcott Parsons & Edward Shils)的「行為的一般理論」(Toward a General Theory of Action)
- (4) 杜伊(Michael Doyle)的「戰爭與和平的途徑」(Ways of War and Peace)
- (5) 奈伊和克歐亨的「超國關係與世界政治」(Transnational Relations and World Politics)
- (6) 華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的「現代世界體系」(The Modern World-System)

以上的著作為以後的新自由主義打下基礎。羅斯陶和杭亭頓的書是了解以後南半球國家面臨的政治和困境的入門之作，而派伸斯的著作是探討體系理論的基本教材，杜伊的專論以比較現實主義、自由主義和馬克思主義為主要架構，其中尤以自由主義的發展歷史和分類最為詳盡。奈伊和柯歐亨很早就主張傳統的現實主義不能解釋冷戰時期的國際關係，國家之間早就互相依賴，國際政治應該以一個整體來看待，「超國關係與世界政治」事實上為他們以後的名著--「權利與國際互賴」鋪路。

華滋的「國際政治理論」出版之後，新現實主義就有最主要代表作，可是新自由主義的出現則是漸進，而且由各家匯合而成。一般認為當奈伊在 1988 年發表「新現實主義和新自由主義」這篇論文時，為了配對，才使用新自由主義這個名詞。<sup>50</sup>若以陶意志出書如此之早，而且奈伊和克歐

---

<sup>50</sup> Joseph Nye, "Neorealism and Neoliberalism," *World Politics*, Vol. 40, No. 2(January

亨也很早就挑戰現實主義的見解，新自由主義在 70 年代末期已經逐漸出現，到了 80 年代就成為風尚。格列柯(Joseph Grieco)就認為 50 年代是功能主義，60 年代是新功能主義，70 年代是國際互賴論，到了 80 年代就由新自由主義來主導。<sup>51</sup>這樣的見解普遍得到其他學者，包括奈伊及克歐亨的同意。奈伊會把兩者並列，並不令人意外。

新自由主義首先強調國際合作的大趨勢，認為新現實主義太重視衝突和軍事安全。其次是和平是可以塑造出來的，規則和法律尤其重要，所以國際體制(international regimes)格外受到重視。接著是世界體系、全球主義、全球治理和全球化的討論也逐漸出現。等到冷戰在 1989 年結束，「民主和平論」、「文明衝突論」、「第三波民主」、「全球化」、「集體安全」、「軟性及智慧型力量」、「資訊化社會」和新安全觀紛紛出籠。原來的功能主義、新功能主義和國際互賴都還在，但已經由多邊主義、全球主義和區域主義來取代。奈伊和克歐亨的「權力和國際互賴」三度改版，內容充分反映新自由主義和國際關係的變化。而威爾遜總統的理想主義觀點到 21 世紀還是有很多新的討論及分析。可見他的影響力是很大的。從 1989 年開始，新自由主義有了非常活躍的 10 年，著作多、理論更多，以後美國新保守主義抬頭，新自由主義氣勢減弱，但美國受困於伊拉克、歐盟的整合不斷往前發展、非傳統安全愈來愈重要、各國對軟權力的重視提升、加上金融海嘯和歐巴馬當選美國總統，新自由主義在學術研究和政策制定上又出現新局面。<sup>52</sup>

毫無疑問，早期推動自由主義和新自由主義貢獻最大的就是奈伊及克歐亨兩人，他們長期在哈佛任教，幾乎就成為哈佛學派，而墨根索和墨斯麥爾扛起現實主義和新現實主義的大旗，在芝加哥任教，一樣也幾乎成為

---

1988), pp. 235-251.

<sup>51</sup> Joseph M. Grieco, "Anarchy and the Limits of Cooperation: A Realist Critique of the Newest Liberal Institutionalism," in David Baldwin ed., *Realism and Neoliberalism: The Contemporary Debat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3), pp. 116-118.

<sup>52</sup> G. John Ikenberry, "The End of the Neo-conservative Moment," *Survival*, No. 46, No. 1 (Spring 2004), pp. 7-23 ; Nils Petter Gleditsch, "The Liberal Movement: Fifteen Years on,"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 52, No. 4(December 2008), pp. 691-712.

芝加哥學派。當然，國際關係的研究並沒有因此而成為哈佛與芝加哥學派之爭。奈伊及克歐亨完全擺脫了傳統的權力平衡，以互相依賴來說明國家之間的權力關係，所以，國家本來就有合作的意願，而人為自己的利益一樣有合作的天性，這是人類社會出現的最原始動機。這樣的見解可以追溯到亞當斯密(Adam Smith)，到了邊沁(Jeremy Bentham)之時，他把功利主義發揮得淋漓盡致。奈伊及克歐亨的專書出版之後，不少自由主義學者撰文證明國家有合作的基本動機，衝突是可以避免的。由合作形成的共同價值、行為典範，追求共同目標，於是有了規則，這不止是國際法而已，國際體制(international regimes)的討論再導引自由制度主義(liberal institutionalism)，新自由主義就確立下來。在這方面，克歐亨的貢獻超過奈伊，因為他出版的「霸權之後」(After Hegemony)及「國際機構與國家力量」(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and State Power)為「權力與國際互賴」作了更完整的補充。<sup>53</sup>等到包得溫(David Baldwin)在 1993 年編出「新現實主義和新自由主義」(Nationalism and Neoliberalism)一書之時，冷戰已結束，新自由主義處在頂峰狀態。<sup>54</sup>造成這種氣勢是多種因素造成的：(1)美國提出了國際新秩序的願景，而福山(Francis Fukuyama)發表了「歷史的終結」，肯定了自由民主的力量；<sup>55</sup>(2)全球化的研究開始，形成新自由主義的熱潮；(3)「集體安全」和「民主和平論」為新自由主義強化了和平的期待<sup>56</sup>；(4)「全球治理」(global governance)為國際關係開拓了新議題，當然也是新自由主義的一部分；<sup>57</sup>(5)歐盟、北美自由貿易區及亞太經合會的成立更證明

<sup>53</sup> Robert Keohane, *After Hegemony* (Princeton,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4). ; idem,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and State Power* (Boulder, Colorado: Westview, 1989).這兩本書再加上他以後的 *Power and Governance in a Partially Globalized World* (London: Routledge, 2002).，成為自由主義的四本最基本的讀物。

<sup>54</sup> David Baldwin, *op. cit.*

<sup>55</sup> Francis Fukuyama, *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 (New York: Free Press, 1992). ; Alan Wolfe, *The Future of Liberalism* (New York: Knopf, 2008).

<sup>56</sup> Michael Brown et al., eds., *Debating the Democratic Peace*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1999).

<sup>57</sup> 三本書是最基本的，他們分別是 James Rosenau, *Turbulence in World Politics* (Princeton,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0). ; James Rosenau and E. Czempiel, eds., *Governance without Governmen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2). ; James Rosenau, *Along the Domestic-Foreign Frontier*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了地區整合有無限的遠景；(6)杭亭頓(Samuel Huntington)的「文明衝突論」為文化及文明研究打開新頁；(7)衝突解決、預防外交、安全對話和信心建立措施成為新自由主義安全研究的核心，和北約及其他同盟體系併存。

前蘇聯的瓦解和冷戰結束對先現實主義造成鉅大衝擊，對新自由主義則帶來無限期待和鼓舞。福山的「歷史的終結」一文引起廣泛討論，他不但歌頌民主的勝利，更是肯定康德，而後以「歷史的終結與最後一人」的專書將新自由主義的政治理念作了完整的分析，對於後冷戰時期的樂觀預期到了「九一一」事件之後不得不提出修正。連帶而來的是對「集體安全」的期待，對聯合國和平維持功能的稱許以及「民主和平論」的風行。歷史證明民主國家並非放棄戰爭，事實上英美等國還一度是帝國主義或對外擴張的倡導者。「民主和平論」並不否認這些歷史事實，他們強調民主國家因為法律、民意及制度的約束，不會窮兵黷武，或者比較傾向和平的外交政策。因此，民主國家外交政策應當以宣揚民主和捍衛民主為主要目標。它成為美國新保守主義的一部分，也成為歐巴馬政府外交政策的理想。「民主和平論」對於其他民主國家，例如西歐、日本、澳洲及加拿大的外交政策一樣有導引的作用。

要把前述主要的新自由主義各家的主張作出有系統的整理並不是容易的工作。最簡單的描述是把新自由主義等同於新制度主義，實際上是融合了國際互賴、體制和國際組織而形成的一套國際關係主張和理想，離嚴格的社會科學理論還有一段距離。它比較上還是接近傳統的政治思想或經濟思想，一方面是要維持國際秩序，另一方面是為人類製造財產，可是它很清楚的沒有富國強兵的主張，更沒有建立帝國的想法。因此，他們的基本命題和現實主義有明顯的差異。(一)是重視人類或個人利益，主張個人利益累積就成為國家利益，所以國家要去照顧國民福祉。(二)是人權重於主權，因此民主價值、制度和生活方式的維護要超過國力的擴張和主權的

---

1997). 另外是 Robert Keohane, *Power and Governance in a Partially Globalized World* (London: Routledge, 2002). ; Lisa Martin ed., *Global Governance* (London: Ashgate, 2008).

伸張。(三)是絕對利益要比相對利益更為重要，也就是說人類社會的整體利益的增加對大家都有利，而相對利益則是一種零合關係，一方之得即為一方之失，所以國家應該要追求總體利益，而少追求相對利益。(四)是世界政府是最理想的境界，可是國際的現實不可能達到這個目標，於是「沒有政府但有治理」(governance without government)是現況，也是各國可以努力的方向，良善治理(good governance)的建立要比世界政府更為可行。(五)是國際法要推行到全世界每一國家的內部是不可能的，可是共同的體制、典範和價值是可行的，尤其是地區的體制和不同文化的共存更是最可能追求的目標。綜合而言，新制度主義就是在合作的最根本基礎上，發展出國際關係的理論，而歐盟的成功及不斷的擴大證明了新制度主義是可行的，更肯定了國際和平與繁榮的樂觀一面。

當然，新制度主義一樣受到質疑及批評。歐洲整合有很長的歷史背景，而第一次大戰之前的歐洲早已經是互賴的國際社會，而外交使節制度很早就建立在歐洲，同樣國際法及國際組織在歐洲也有很長的歷史。以這樣的背景發展出今天的歐洲整合是很自然的結果，可是要以此來預測其他地區會有相同的結果恐怕過於樂觀，甚至天真。除了北美地區之外，要找到和歐洲一樣的整合成果並不可能。即使民主和平和集體安全也是相當的不穩定，或過分的理想化。在前述的新自由主義理論之中，可能只有「文明的衝突」、「全球化」、「全球治理」得到較多的實際證據，理論的解釋力和可預測性較高，政策上的適用性也同樣較高。

「文明衝突論」成為杭亨頓一生最受注意的成就，雖然該書並非他最佳的著作，<sup>58</sup>而經過「九一一」事件之後，他的預言成真，宗教、文明及文化在國際關係的重要性從此受到格外的重視，已經不是新自由主義可以涵蓋的領域。「全球化」的理論影響則遠超過杭亨頓的「文明衝突論」，一樣是新自由主義無法單獨處理一門重大的學科。唯一剩下的是「全球治理」這個領域，它融合了互賴、體制、經濟整合和國際組織，在可見的未

---

<sup>58</sup> Samuel P. Huntington, *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 and the Remaking of World Order*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1996).



來有更大的發展空間。原因是新制度主義也被廣泛的用於「全球治理」，而日趨重要的良善治理、公共管理和創新成為已開發國家、新興經濟體和轉型國家共同追求的目標。在金融海嘯和非傳統安全的衝擊下，「全球治理」成為大國必須了解的治國之道。<sup>59</sup>

全球化、全球主義和全球治理相互關聯，全球化代表的是一種國際社會或人類發展過程及結果，而全球主義代表的是一種主張、理想或政策。全球治理則是秩序的維持、資源的運用和問題的解決，由國內治理延伸出來，和公共政策或公共管理有不可分的關係。這三大領域和工業革命、世界市場的出現、資訊流通和交通工具的改良都有密切的因果關係。工業革命啟動全球化、導致全球主義，最後形成全球治理，這個名詞最先在 1992 年世界銀行率先使用，最早指的是國際經濟組織的運作及衡量國際規則、典範和體制的功能，觀察它們如何帶動國際社會的進步。聯合國、國際貨幣基金、世界貿易組織是研究的重點，現在則包含了無數的國際性非營利組織或第三部門。1995 年「全球治理」季刊的發行，代表國際關係學界對它的重視，就等於「國際安全」、「外交事務」或「衝突解決」等季刊的發行所顯現的學術意義是相同的。「國際安全」幾乎已經凌駕其他學術期刊，成為國際關係最有影響力的刊物。經過多年的研究，現在的「全球治理」已經融合國際關係、國際法、國際組織和國際經濟，成為一門相當重要的分支學科，把它歸入新自由主義只是便於說明，它事實上早已單獨存在，將來的發展是無可限量。

## 伍、社會建構論

社會建構論是否足以成為國際關係的三大典範之一，在學界一直有爭

---

<sup>59</sup> 全球治理和良善治理是當前比較政治、公共政策、國際關係和國際政治經濟學的最核心研究領域，它配合個案教學及各國的文化特色形成未來最有發展遠景的社會科學的分支學科。請參閱 Lisa Martin, *op. cit.*

議，有人甚至不認為它是一種理論。在 80 年代末期，社會建構論開始出現時，這樣的見解普遍被接受，可是今天的情形已經有很大的改變。要作為一項典範，它必須要有一套知識社群共同接受的基本命題、解釋範例、科學的研究方法，進而能夠解決人類所面臨的問題。在理論、解釋、預測和政策四大方面，社會建構論在初期確實有不足，經過 20 年的發展，它的成長已經不同凡響。<sup>60</sup>

一般認為冷戰結束，自由主義和現實主義都沒有預測到，於是學界反省之後，才提出社會建構論。這樣的說法只是說明部份的原因而已。要特別說明的是，國際關係要處理的學術及政策問題愈來愈多，冷戰的結束並不表示問題的減少。相反的，後冷戰之後的學術研究要求更高，而且政策的迫切性更為明顯。這些當然不是自由主義和現實主義可以應付的。所以，純粹從實際的需要來說，社會建構論的出現幾乎是不可避免。這也再度證明科學的產生和發展都是為滿足人類的需要而起的。

從國際關係的學術研究來觀察，這門學科在第二次大戰之後就一直不斷的有自我反省和辯論。我們可以把大約 30 年的辯論綜合起來，<sup>61</sup>一是國際關係的哲學基礎和社會科學的屬性還是相當薄弱的，它對最基本的科學哲學或社會科學本質的討論是有限的。長期以來，國際關係要處理急迫的國家安全和外交問題，當然無暇去思考這些最根本的治學之道。也就是說，社會科學的最根本本體論、認識論和方法論是被忽略的。於是，愈來愈多的研究發現這個需要，這是社會建構論出現的原因之一。克歐亨把現實主義和自由主義所主導的國際關係研究歸為理性主義，以後則稱之為反思學派，這是很貼切的描述。<sup>62</sup>

<sup>60</sup> 最簡明的入門教材是秦亞青，*文化與國際社會：建構主義國際關係理論研究*(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2006 年)。莫大華，「論國際關係理論中的建構主義」，*問題與研究*，第 38 卷第 9 期(1999 年 9 月)，頁 93-109。袁易，*中國連續國際導彈建制的解析*(台北：五南，2004 年)。

<sup>61</sup> 一般認為國際關係理論一共有四次的大辯論，第一次是理想主義和現實主義，第二次是傳統派與科學派，第三次是新現實主義與新自由主義，第四次是理性主義與反思主義。

<sup>62</sup> Robert Keohane,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and State Power* (Boulder, Colorado: Westview, 1989), pp. 11-12.

二是社會建構論是現實主義和自由主義導引出來的，冷戰結束只不過加速它的研究而已。現實主義強調權力，而自由主義重視規則，於是權力塑造平衡，而規則維持秩序。這樣的命題和以後發展出來的理論真的能夠解釋國際關係嗎？它最根本的問題是長期以來，國際關係就認定，無政府的國際社會早已存在，國家別無選擇，只會追求權利和利益，或遵守規則和典範，和其他國家合作，以謀取最大利益。對於重視批判、檢驗和多元的社會科學家來說，這樣的學科基礎自然受到挑戰。長期存在的太多命題、觀點和看法就有重新解構的必要。唯有透過解構的過程，重新的檢驗和辯論，國際關係才能再往前發展。

三是國際關係長期受歷史學、政治學影響，甚至主導，以後又加上經濟學。可是國家存在於國際社會就像是人存在於社會，它為什麼從俗守法？社會秩序為什麼能夠維持下去？社會為什麼會有變化？這些都是社會學長期研究的問題。事實上，從韋伯(Max Weber)、涂爾幹(Emile Durkheim)到當今的季登斯(Anthony Giddens)，社會學一直就想找出人和社會互動的類型、過程及結果。如果國際關係要走向科學一體化，社會學或許可以提供更好的協助。於是，社會學為基礎的社會建構論者開始打開了這個知識的大門。<sup>63</sup>

和現實主義及自由主義相比較，社會建構論比較難懂，特別是它和國際關係的學術相關性。韋伯、涂爾幹、李維史陀(Claude Levi-Strass)、索緒爾(Ferdinand de Saussure)、皮亞傑(Jean Piaget)、福柯(Michel Foucault)和季登斯的論述對一般研究國際關係者是相當陌生，更不用說決策者。這些社會科學的最基本哲學爭論和方法論上的派別及不同主張各有其思想淵源，代表西方國家長期的人文和社會科學成長。國際關係要建立它的學術地位不能不和這個學術傳統結合，實際的外交決策則無此需要。事實上，韋伯等人對於人類政治行為、思考方向及語言表達的研究在政治學的領域中早就被引進，而且發揮了相當重要的影響力。政治學方法論、政治文化

---

<sup>63</sup> 最代表性的著作就是 Alexander Wendt, *Socia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及政治社會學的討論很早就得利於韋伯及前述學者的啟發。要作好政治學的研究，不閱讀韋伯的著作是很難想像的事。即使季辛吉也受惠於韋伯的啟發。<sup>64</sup>

華滋、華勒斯坦、陶意志等人所訴求的科學一體化的主張，引導社會建構論者進行更有系統的反思。社會建構論的大師溫特(Alexander Wendt)就是為了挑戰華滋及華勒斯坦的著作，出版了「國際政治的社會理論」(Socia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一書。而陶意志的許多著作，包括他提出的「安全社群」概念和以後歐洲整合的實現，是社會建構論經常引述的例證。<sup>65</sup>許多批評華滋的意見成為溫特主要的參考，而自由主義所強調的互賴、體制、合作和治理一樣是社會建構論討論的重點。以「國際社會」為討論核心的國際關係英國學派更和社會建構論關係十分密切，亞太地區的區域組織、對話和經濟整合一樣可以找到社會建構論的論述根據。「人類安全」、「綜合安全」及「新安全觀」等有關安全研究的主張或提議也是根據這個國際關係的新典範。<sup>66</sup>

溫特在1987年所發表的「國際關係理論的能動者與結構的問題」專文被認為社會建構論的引言。<sup>67</sup>他強調國際關係和其他社會科學的學科一樣，不能只觀察現象，一定要從結構著手，社會有社會結構，國際政治也有結構，它界定、制約、規範能動者，也就是國家。能動者和結構之間的關係就是要了解社會行為的本質。華滋在他的「國際政治理論」出版之後，導引出太多的辯論，而其中最根本的社會科學的本體論和認識論就會被提出來討論。在此之前，國際關係本來就有科學派和傳統派之爭，科學派的實證主義在華滋的專書問世之後受到更多的批評，後實證主義、批判主義和後現代主義相繼出頭。他們強烈質疑新現實主義的主張，認為把國際關

<sup>64</sup> Henry A. Kissinger, "Domestic Structure and Foreign Policy," in James Rosenau ed., *International Politics and Foreign Policy* (New York: Free Press, 1969), pp. 261-275.

<sup>65</sup> Emanuel Adler and Michael Barnett, eds., *Security Communitie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

<sup>66</sup> Allan Collins ed., *Contemporary Security Studie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 Paul Williams, *Security Studies* (London: Routledge, 2008).

<sup>67</sup> Alexander Wendt, "The Agent-Structure Problem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41, No. 3(Summer 1987), pp. 335-370.

係的結構視為必然，而且把國家追求自助、強化權力和累積財富的物資化行為一樣視為當然是值得質疑的。在溫特出版專文之前或同時，早有不少的學者從後實證主義或批判主義的角度對既有的國際關係理論進行重新解釋。沃克(R. B. J. Walker)、戴瑞安(James Der Derian)或艾希利(Richard Ashley)是代表人物。<sup>68</sup>他們的著作和墨根索或墨斯麥爾完全不同，和華滋比較容易連接，和克歐亨、奈伊一樣可以連結。這就是很多人說後實證主義者是要改善國際關係的知識，並不是要去否定既有的知識。他們想要做一位社會科學家，而非歷史學家。要了解他們的背景，非得從西方的科學哲學始開始不可，否則現代主義、後現代主義、實證主義和後實證主義代表什麼意義，為什麼要用到國際關係來就不知其所以然。

溫特的「國際政治的社會理論」已經成為社會建構論的代表著作，地位和華滋、克歐亨和奈伊是相同的。在出版這本書之前，他的論文「無政府是由國家造成」(Anarchy is What States Made of it)樹立了他在社會建構論的名聲。除了他的著作之外，下列的專書也是有參閱的價值：

- (1) 雷瑟和古德曼(George Ritzer and Douglas Goodman)的「社會學理論」(Sociological Theory)
- (2) 季登斯(Anthony Giddens)的「社會的構成」(The Constitution of Society)
- (3) 歐乃夫(Nicholas Onuf)的「我們製造的世界」(World of our Making)
- (4) 柯拉齊維爾(Friedrich Kratochwill)的「規則、典範和決定」(Rules, Norms and Decisions)
- (5) 卡真斯坦(Peter Katzenstein)的「國家安全的文化」(The Culture of National Security)
- (6) 艾德勒和巴奈特(Emanuel Adeler and Michael Barnett)合編的「安全社群」(Security Communities)

<sup>68</sup> James Der Derian and M. Shapiro, eds., *International/ Intertextual Relations: Post Modern Readings of World Politics* (Toronto: Lexington, 1989).

(7) 戴瑞安和夏比諾(James Der Derian and Michael Sapiro)的「國際和文本之間的關係」(International/ Intertextual Relations: Post Modern Readings of World Politics)

第一本書是社會學理論的介紹，了解了各主要大師的理論等於是熟悉政治思想史和經濟思想史一樣，所以，這是一定要讀的。季登斯是闡述「能動者和結構」最權威的社會學家，自然是明白社會建構論不可缺的著作。歐乃夫事實上要比溫特更早加入社會建構論的世界，不過，他早期是鑽研國際法及國際組織，知名度就遠不如溫特。柯拉齊維爾的分析是幫助我們去了解國際關係的規則和典範。這裡的典範不是孔恩所說的科學典範，而是人類行為典範。他要說明為什麼國家會在國際社會中去遵守規則和典範。卡真斯坦從文化的角度去分析國家安全，是當前了解戰略文化的代表著作，當然也是社會建構論的佳作之一，艾德勒及巴奈特的著作就比較遜色，但一樣幫助我們了解為什麼西歐的那麼多安全對話、轉型的北約和東協區域論壇、上海合作組織是可行的。戴瑞安和夏比諾的著作是後現代主義對國際關係的影響最好說明，可惜在一般研究和教學中，這本書及其他相關的著作都不太受人注意。太多的國際關係學者或外交界菁英對於後現代主義或後實證主義的內涵和他們的學術影響並不重視。

和現實主義和自由主義一樣，社會建構論也是有不同的分類，但這些分類反應出不同學者的取樣標準，筆者認為這是研究或教學的必要，可以由個人去決定，本身沒有什麼對錯的問題，更何況它也反應出研究者的喜好。作為國際關係的一種科學典範，社會建構論沒有共同的信念、範例或觀點。<sup>69</sup>

- (1) 社會建構論的主體是社會學，但他們並不排斥歷史、政治學或經濟學，反而非常重視科際整合，認為國際關係如果不走上科際整合，它必然會走上多種理論和分歧領域的方向，結果可能是更加的差異，但也出現理論上的自我矛盾或自相抵觸。

---

<sup>69</sup> 下列的觀點完全是作者本人針對溫特、歐乃夫、柯拉齊維爾等人的著作和新現實主義和新自由主義的比較之後，做出的初步結論。

- (2) 社會建構論從社會學的角度和架構去分析國際關係，最終目的在了解國家的行為、反應和政策，「能動者和結構」是一個入門和分析的科學性架構，目的在提升國際關係的科學本質。而科學本質的提升要強化質化研究，而不是以往強調的量化研究。他們接受國際社會無政府的現實，也認為國家是最主要的成員或單元。可是，他們強調無政府的國際社會並非一個既存，而且永遠不可改變的事實，當然國家更不是唯一，而且永遠不變的成員。
- (3) 國際關係要跨出傳統的思維，也就是它不再是一種國家處於叢林之間的自救或自存之道，它就像是社會中的個人，社會制約了個人的行為，當然個人也會改變社會，他們兩者之間就是一種能動者和結構的關係，受到文化、規則及典範的約束或導引。國家是國際社會的成員，必然就受到國際社會的指引。國家之間要相處，所以態度、認同和文化就格外重要。以往的國際關係是要觀察和分析國家如何去控制和打敗對手，沒有改變既存國際無政府社會的打算，這是政治學或歷史學的思考，社會學則認為國際社會不是國家誕生出現就有的，無政府社會是國家開始互動之後才出現的，它當然可以重新塑造，讓秩序更好。
- (4) 社會建構論強調國家在互動的國際社會中要先確定身分，有了身分之後，才有利益、認同的問題。國家有了認同才知道自己是誰，有什麼角色，如何和別國相處，就像教授和學生一樣，他們的角色、認同及身分不清楚，就無法去定位他們的立場或利益。以往現實或自由主義認為國家的身分由主權、領土和人民去界定，以後只有力量的大小，只要國家一獨立存在，就有國家利益。而這些利益大部分是具體的、可以衡量和使用的。社會建構論認為利益要隨著身分的確立，這樣所認知的利益才有意義，追求的利益才有可操作性。
- (5) 國際關係的運作和研究、文化、理念和思想的了解就很重要，社會建構論並不否定國家的物質性力量，但更加重視語意性力量

(discursive power)，它的意涵遠超過軟性力量或智慧型力量，也超過以往國際關係強調的認知、形象或心理圖案，它很顯然受到社會學符號互動論的影響，主張要了解個人的行為要從社會生活著手，同樣的，要明白國家的對外政策一樣要從國際社會的各種活動和國家的調適及反應開始。

溫特在他的「國際政治的社會理論」書中，借用霍布斯、洛克和康德三種文化來描述國際社會，它構成了社會建構論對國際關係的最主要部份。<sup>70</sup>三種文化很容易理解，霍布斯文化意指現實主義的社會，競爭和衝突無法避免，洛克文化則是過渡型，有合作也有競爭，康德文化就是自由主義所描述的合作型國際關係。溫特的最大貢獻就是把社會學的理論用到國際關係，解釋可能產生的變化，就像社會學解釋各種社會變遷是一樣的。溫特本來有意把現實主義和自由主義連接起來，並沒有達成這項艱難的學術工作。有了西方政治思想作為輔助，加上豐富的社會學理論，溫特的社會建構論已經在國際關係打下地位。這個地位是要和很多人分享的，例如歐乃夫、柯拉齊維爾、卡真斯坦、魯奇(John Ruggie)和杜渥(Raymond Duvall)。<sup>71</sup>

社會建構論的優點在於：(1)它不是單一的理論，而是科際整合的良好範例，現實主義或自由主義也有類似的整合，尤其是自由主義，但不如社會建構論的成功。它融合了社會學、政治思想、科學哲學、媒體研究和傳統的國際關係而成為一種新典範。當然，各家還是各有重點，側重也有不同，溫特的主張比較溫和，合乎主流社會學理論，受到比較多的支持。(2)社會建構論體現出認同、文化及理念的重要性，它要改變長達數世紀現實主義的領先地位是不可能的，富國強兵已經成為一種傳統，幾乎是意識型態，可是在資訊和全球化的時代，大家體認到文化的重要性，於是對

<sup>70</sup> Alexander Wendt, *Socia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op. cit.

<sup>71</sup> Ted Hopf, "The Promise of Constructivism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3, No. 1(Summer 1998), pp. 171-200. ; Jeffrey Checkel, "The Constructivist Turn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World Politics*, Vol. 50, No. 2 (January 1998), pp. 324-348. ; Dale Copeland, "The Constructivist Challenge to Structural Realism,"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5, No. 1(Fall 2000), pp. 187-212.



戰略、政治、企業文化有更廣泛的研究。社會建構論的貢獻不小，以後的發展還會繼續下去。(3)幫助我們了解國家的差異性，而這個差異性不是從物質的力量或軍事對比去衡量，這種研究態度具有更高的人文關懷，也是一種文明社會的展現。這裡也可以看出政治、經濟、歷史和社會學的不同，這樣的說法並非表示社會學有更高的價值或道德標準，而是它的基本出發點在於建立和維持秩序，要求社會內所有成員遵守共同法則，了解社會變遷的道理和預測未來發展的方向。人類社會不會停滯不前，解釋社會的理論當然也就要連帶解構和建構，這是社會建構論成功的地方。(4)傳統的國際關係非常重視民族主義、主權及民族國家，這三項幾乎就是國際關係的最根本動力。社會建構論從身分、態度及認同切入，建立了認同政治觀，讓我們更完整的了解了民族主義、種族、性別、宗教、族群、團體的看法，行為典範如何去影響國內及國際政治。經由這個了解，大家明白了衝突可以預防和解決，和平一樣是可以塑造，認知和認同也是可以改變的。仇恨和衝突自然有解決的方法，只是時間長短而已，這對於全世界許多爭端地區來說，是一個很正面的理論架構。這也就是為什麼那麼多歐洲安全合作個案、信心建立措施、東南亞或整個亞太的安全建構(security architecture)會被提出來討論並加以肯定的原因。以後兩岸關係如果朝更和平的方向發展，必然也是社會建構論者樂於研究的個案。

任何典範都有缺點，社會建構論也不例外。分別說明如下。

- (1) 國際關係和社會學的相融性和連接性一直是問題所在，要克服它並不容易。傳統國際關係從外交史或歐洲政治史開始，進到國際政治和國際經濟的領域，再加上國際公法和私法，這是長達數世紀的學術發展歷程。社會學和國際關係或外交的關連性幾乎是不存在。國際社會的概念由英國學派提出，而提出的學者並非社會學家。以後英國學派被認為與社會建構論相關則是後來才發現的。從整體國際關係的研究來看，大部分的學者對於社會學的理论比較陌生，僅管馬克思、韋伯和涂爾幹對於國際關係的研究還是有他們的影響力，尤其是馬克思。這種相融性和連接性的不定說明

了社會建構論在短期內要超越現實主義或自由主義是有其困難度。

- (2) 社會建構論要具體落實在外交政策制定和國際問題的解決需要一個適當的轉化。社會科學的研究不能脫離社會的現實，也要針對現有的社會問題。即使沒有提出解決方法或具體的對策，現象和問題的分析本身也是貢獻，更是社會科學的功能所在。很長一段時間，社會建構論停留在理論的介紹和討論。對於國際關係的決策者和知識社群而言，太多後實證主義或後現代主義的批評是不容易理解的。即使溫特提出的「能動者和結構」的分析架構一樣是不容易明白。基本概念、名詞和理論的分析要花很長的時間，要再落實成為具體政策一樣需要決策者接受了這個理論之後才有可能。除非是研究國際關係學者出身的決策者，大多數的國家領導人不清楚社會建構論的意涵，但對於現實主義或自由主義則容易理解。這就說明了為什麼大多數先進國家的外交政策是使用這兩種基本的典範來分析或溝通。
- (3) 社會建構論的主要目的在於補充華滋和華勒斯坦的主張，提出一套解釋後冷戰時期國際關係變化的理論。我們經由社會建構論確實更明白後冷戰時期的衝突，尤其是宗教、種族和價值所引發的各種緊張情勢，甚至地區性的戰爭。可是，社會建構論無法取代全球化、全球治理、甚至於權力平衡。我們可以從戰略文化去了解中國外交和國防，但要去思考對策時，不管是交往、圍和或軟性平衡，不完全是社會建構論。這說明了到今天還是有不少人認為社會建構論其實只是對現有國際關係的另外一種解釋，是一種研究途徑而已。
- (4) 以上的說明並不能否定社會建構論的地位，它畢竟不是單獨存在，和社會學和整個社會科學的發展有太密切的關係。社會學本身已經有很紮實的基礎，它對國際關係的協助不能小看。我們把它引進社會學是正確的發展方向，它不但可以提升國際關係的科學層

次，更能幫助這個學科去面對國際社會愈來愈多的非軍事性和非政治性問題，他們絕不是「非傳統安全」可以完全涵蓋的。如果社會學可以幫助我們了解各國的國內社會，解決愈來愈多的社會問題，社會建構論一樣是可以協助我們重新塑造一個更為穩定與和諧的國際社會。

## 陸、典範轉移

以上的討論只限於國際關係的三大典範，而其他的典範，例如女性主義、批判主義、後現代主義都沒有討論。社會科學每門分支學科中的典範多元化是很正常的發展，國際關係不是唯一的例外。比起經濟學、政治學和社會學，國際關係的典範多元化不足為奇。只是到今天為止，還是有不少知識社群認為國際關係應該隸屬在政治學之下，政治學的典範足供國際關係研究之用。這樣的主張並不能減緩國際關係本身作為一個獨立學科的發展，而它的典範自然也就不斷的轉移，1989年冷戰結束以來的變化令人應接不暇，未來的成長更是不可限量。

造成典範轉移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國際關係結構性的改變是最根本的原因。<sup>72</sup>這個結構由冷戰時期的兩元轉成後冷戰時期的短暫多元、美國主導的單元、現在是否又形成了一種無極(non polarity)的結構？如果是如此，它勢必會回到1815年維也納會議之後的歐洲協調時期，整個國際秩序的維持是由大國來共同協商，問題是美國國力真的衰退到如此的地步？比較平衡的分析應該是美國的軍力還是領先，可是軍事以外的領域不能沒有多國的合作。這樣的軍事超強地位能夠維持多久一樣是值得密切觀察的關鍵因素。如果把軍事暫置一旁，非軍事性的合作就是很大的活動範圍，也是

---

<sup>72</sup> 參閱 T. V. Paul and John A. Hall, eds., *International Order and the Future of World Polit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 Robert Gilpin, *War and Change in World Polit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2). ; David Dewitt et al., eds., *Building a New Global Order* (Toronto: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研究的重點，這就使得自由主義有很大的發展空間。典範會轉移是很自然的結果，否則知識社群無法掌握和了解這些結構性的變化。

在這個大結構下，國際關係有太多的問題，我們可以使用政治、經濟、安全議程(*agenda*)來說明。<sup>73</sup>毫無疑問，這些議程是變得相當複雜、冗長和豐富。今天有不少人擔心新冷戰是否已經開始，這樣的反應是很自然的，因為中國崛起、俄羅斯的復興及金融海嘯帶來的衝擊。可是不要忘記的是 2009 年和 1945 年畢竟不同，美國要對中國和俄羅斯再圍堵已不可行，而中國和俄羅斯與美國的利益有太多的重疊，不合作一樣是不可能。太多的證據可以顯示中國和俄羅斯最在意的是美國。競爭和歧見無法避免，可是新冷戰恐怕是太早的預言。正因為如此，比較急迫的是結合知識社群和決策人士處理愈來愈複雜的國際關係議程。展望未來的 20 年或 21 世紀，國際關係所將面臨的挑戰和 20 世紀有許多根本上的不同。氣候變遷、疾病、能源已經很明顯，隨之而來的是文明衝突、武器擴散和發展的不均衡將使得國際秩序更難以維持，解決之道在於問題的釐清和研究，要達到這個目的，典範的轉移是必要的。

造成典範轉移的另外一股力量是知識社群的反思和自省。<sup>74</sup>雖然孔恩提出典範這個概念之後，西方學界一直有爭論，可是到了今天，大家已經普遍接受，認為它不但適用於物理學，其他學科也可以使用。知識社群面對快速變化的國際關係，加上高等教育和學術研究的競爭力，必須不斷的求新和求變。新的概念、模式和理論，甚至於研究方法，不斷的出現是必然的結果。在過去六十年，國際關係的成長是有目共睹的事實。典範轉移是最關鍵的部份，因為它是引領任何學科往前發展的最大動力。

典範如何轉移？轉移的動機來自知識社群，尤其是大學和研究機構，前者側重理論的重新檢驗和建構，而後者則是從政策制定去考量。<sup>75</sup>從全

<sup>73</sup> 最有代表性的著作還是 Peter Katzenstein ed., *The Culture of National Security*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6). ; Barry Buzan et al., *The European Security Order* (London: Pinter, 1990).

<sup>74</sup> 參閱 Judith Goldstein and Robert Keohane, eds., *Ideas and Foreign Policy* (Ithaca, New York: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3).

<sup>75</sup> 對於這個問題的討論最好的著作還是 Judith Goldstein and Robert Keohane, eds., *Ideas*

球治理引申出來的一系列理論，和自由主義相關，又和國際法、國際組織、國際經濟和公共管理不可分。政策方面涉及的層面更廣，舉凡金融、交通、通訊和環保都包含在內。傳染病的預防和治理就是全球治理很迫切的領域，這也是現在和未來都要處理的問題，決策者和知識社群必須要改變舊有的典範來滿足實際的需要。要特別強調的是，知識社群不完全為了滿足決策的需要而進行典範轉移，研究本身的反思和檢驗有些是純學術性，就像經濟學和社會學一樣，但研究的成果難免有政策上的效益。

知識社群的反思和自省有共同的規則可循，也有相同的理念和價值標準。這是科學一體化的最基本要求，即科學的要求和標準必然是超越國界，也是知識界的共同語言，在人文和社會科學尤其應該如此。<sup>76</sup>文明有不同，文化有差異，可是科學的求真精神和人文的關懷和修養是普世的價值。在國際關係的領域中，追求和維護和平就是放諸四海而皆準的共同目標。追求和平的方法固然有差異，但作為研究的典範是超越國界的分析基礎。以今天社會科學調查方法的多樣，國際關係也不例外，一個典範之內有數種理論或方法或工具是很平常的事，得到的結論一定要經得起科學化的檢驗。

大學毫無疑問是主要典範的來源。哈佛、哥倫比亞、芝加哥和明尼蘇達大學及倫敦政經學院一直是現實、自由主義以及社會建構論的啟蒙之地。大學、各專門學科的期刊以及學會的年會，配合研究生的培養，形成了知識社群的構成基本要件。不過，近年來國際關係所涉及的政策研究交由專業的研究機構去進行，有些不是純粹的學術機構。在西方國家已經有了權威性及代表性。他們的研究成果也會改變典範，這個趨勢愈來愈明顯。武器管制、疾病預防、氣候變遷和能源開採就不是大學可以單獨處理的重要政策議題。獨立的非營利專門機構的重要性愈來愈明顯。

---

*and Foreign Policy: Briefs, Institution and Political Change* (Ithaca, New York: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3).

<sup>76</sup> 這也是 Thomas Kuhn 的最基本精神，兩本著作是很好的對比，Mark Kauppi and Paul Viotti, *The Global Philosophers* (New York: Lexington, 1992). ; Robert Rothstein, *Planning, Prediction and Policymaking in Foreign Affairs* (Boston, Mass.: Little Brown, 1990).

個人當然也是改變典範的重要推力。諾貝爾獎得主或傑出的學者和公共意見領袖通常會有準確的預言，也有傑出的研究，他們去改變典範是可以預期的。社會科學的研究往往是單獨進行，個人的發現改變學科的研究方向是經常出現的，經濟學如此，國際關係也是相同。只是學派形成之後，現在的典範轉移愈來愈要有研究團隊的集體努力，單獨的學術創見相對減少。在國際關係領域中，由於科際整合的需要，在非國際關係學者的引領之下，典範轉移成為可能，特別是國際政治經濟學和國際安全，許多典範轉移就來自經濟學和軍事科學。

國家及私人企業的力量是不能輕易忽略的。<sup>77</sup>國家控制和分配預算、科研的方向及重點，就會催生典範轉移。這在物理、化學和許多生物醫學的研究是常見的現象。太空科學、奈米科技、遺傳工程和資訊科技的研發就和國家角色密切相關。人文與社會科學也有相同的政策效應，國際關係也不例外。美國在冷戰時期為了應付前蘇聯的挑戰所進行的國際和區域研究是最好的說明，而歐洲各國為歐洲整合和安全投下的研究更是不計其數，中國為了進行大國外交、加入世界貿易組織、推動和平崛起所進行的相關研究一樣有相當的深度和廣度。在這些研究之中，私人企業所提供的資助是善盡社會責任的表現，他們不會干預研究的內容，協助推展知識和強化知識的力量所得到的正面效益是無法計算的。

聯合國及其專門組織所帶動的研究、制定的政策導引出來的典範轉移一樣是有積極的貢獻。在國際法方面，聯合國的角色就是很突出。在武器管制、預防外交、人類安全、環境保護和世界經濟秩序的維護等方面，聯合國一樣有很多的建議或具體作法。有些被稱之為國際體制的形成，還不至於是典範的轉移。世界衛生組織、糧農組織和文教組織所帶動的全球意識，帶動起來的全球治理也是一項助力。世界貿易組織加上許多功能性的國際組織一樣為全球治理打下基礎。典範轉移絕非單獨學者或國際成員可以促成的。

---

<sup>77</sup> 國家的高等教育政策指導國際關係的研究，而企業界則提供適當的財政支援，兩者相輔相成。

典範轉移帶來什麼結果？在學術研究上，我們容易可以見到科學的革命，這樣的描述不見得被廣泛的接受，可是新理論的建構是必然的，連帶而來的是解釋更為完整，對於世界情勢的掌握更為準確，預知的能力也自然更加強化。在處理實際問題上，國際組織和各國政府，甚至於跨國企業一樣可以制定出更為有效的因應對策。預防和處理危機、化解衝突和消弭戰爭的能力也一樣增加。只是國際問題太多，各國的利益又不一致，國際組織的功能無法整合及發揮，外交政策往往以單獨國家為著眼點，整合型的國際共同決策以處理功能和經貿問題居多，政治性問題受限於主權，則缺乏一致性的決策。

雖然如此，典範轉移帶來的動力是相當大的。一是歷史的重新解釋不斷出現，冷戰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傳統的見解是以美國為主導的西方世界贏得了冷戰，可是原因何在？結果又是如何？這各問題已經討論了 10 年以上。其他還有許多的國際重大事件，包括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戰，或者越戰和韓戰還在不斷的重新解釋。和平方面的問題也是如此，民主真的能帶來和平？在全球化和資訊化的社會，外交和外交政策會有什麼改變？它涉及到不只是歷史的重新解釋，而是人類的智慧的新挑戰。就像工業革命一樣，我們遇見的是不同的環境和問題，當然就不能使用舊的思維去處理新的問題。

二是太多的國際制度面對修改或調整的壓力。因為典範的轉移，帶動了制度或機制的改變，雖然只是局部或部分的修正，但已經有很大的貢獻。從聯合國開始，我們可以看到許多國際組織的功能逐漸調整，他們結構性問題還存在，例如安理會常任理事國是否應該增加，整體來說，改變是在不斷促使國際社會思考必要的對策。自由主義、現實主義和社會建構論所帶來的國際制度強化已經展現在爭端的處理、和平的維持、經貿紛爭的解決和其他功能性合作的強化。從 1997 年的亞洲金融危機和 2008 年的全球經濟低迷，我們就可以見到國際社會處理危機能力增加，和 1929 年的經濟大恐慌無法相比。

三是典範的轉移的確為國際社會共屬感帶來新的體認。即使全球化仍

然有很大的爭議，不爭的事實是國家間的距離縮小，界限變得模糊。我們還不能說是無國界和無距離，可是資訊化和網路化的結果，我們處在一個比以前更為自由的空間，資訊流通更為快速，分工變得更細，互賴程度更高。文化和文明的差異仍然存在，而且短期之內不容易消失，正因為如此，社會建構論為國際社會增添了一個解釋的面向。

需要強調的是，典範轉移本身就不是所有國家知識社群可以接受的。它是一個西方國家的概念，我們用來描述國際關係的轉變，至於學科的成長和治理的改善還是需要每一個知識社群和國家來處理。什麼時候國際社會出現一個整體的知識社群和世界政府無法預知，在此之前，典範轉移只是提供了一個概念架構，當然也是一門科學哲學，讓我們了解自然和社會科學的成長，也讓我們更明白人類在面對自然、人際和他們自己想像的環境時，如何去處理各式各樣的國內和國際社會問題，也包括了每個人的問題。<sup>78</sup>

## 柒、 結論

典範的使用不是權宜，更不是追隨西方學界的作法而不加以檢驗。國際關係的研究和運作受到強國的主導是很自然的結果，而典範形成國際知識界的共同典範之後，我們接受並採用是科學研究的基本態度。接受了典範的用法並非表示我們對西方國家的國際關係理論照單全收。即使國際關係長期以來被認為是美國的社會科學，英國學派、哥本哈根學派或其他學派還是有一席之地。重要的是在理論的內涵，而不是在名詞的爭議。理論可能長期被接受，也可能被否定，這是社會科學的本質，國際關係也是如此。今年正好是國際關係單獨學系在西方大學成立 90 週年，展望過去的成展確實令人刮目相看，未來的遠景更是可以預期。

---

<sup>78</sup> Charles Kegley and Eugene Wittkopf, eds., *The Global Agenda* (New York: McGraw-Hill, 1998). ; Paul Kennedy, *Preparing for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93).



國際關係、國際政治經濟、國際安全和國際法的研究，我們如何能夠找出一個合理、妥善的解決方法，對於整個社會科學學界及國際社會的貢獻就難以形容。它的困難度很高，但是所有科學的研究都是困難的，只要兩岸的知識社群秉持科學的精神及態度，這個問題應該可以克服。

國際關係作為正式的大學科系只有九十年，可是國際關係作為人類的知識已經長達數千年，它和哲學、政治、經濟、歷史及法律不可分割。有這麼豐富的知識作為基礎，國際關係的研究遠景是很廣闊的。最近二十年，在全球化和資訊化的驅動之下，國際關係的改變更是快速，在下一個九十年的進步是無法預言的，我們的共同期待是世界更和平，大國政治不是悲劇，而文明是融合及相輔相成的。

(收稿：2009年11月16日，接受：2010年4月22日)

## 參考文獻

- 王正毅、張岩貴，**國際政治經濟學**(北京：商務印書館，2003 年)。
- 王邦雄，**韓非子的哲學**(台北：東大，1993 年)。
- 唐端正，**先秦諸子論叢**(台北：東大，1995 年)。
- 秦亞青，**文化與國際社會：建構主義國際關係理論研究**(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2006 年)。
- 袁易，**中國連續國際導彈建制的解析**(台北：五南，2004 年)。
- 莫大華，「論國際關係理論中的建構主義」，**問題與研究**，第 38 卷第 9 期(1999 年 9 月)，頁 93-109。
- 黃光國，**社會科學的理路**(台北：心理，2001 年)。
- 閻學通、孫學峰，**國際關係研究實用方法**(北京：人民，2001 年)。
- Acharya, Amitav and Evelyn Goh, eds., *Reassessing Security Cooperation in the Asia-Pacific*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2008).
- Acharya, Amitav, "The Emerging Regional Architecture of World Politics," *World Politics*, Vol.59, No. 4(July 2007), pp. 629-52.
- Acharya, Amitav, *Constructing A Security Community in Southeast Asia* (London: Routledge, 2008).
- Adler, Emanuel and Michael Barnett, eds., *Security Communitie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
- Baldwin, David ed., *Neorealism and Neoliberalism*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3).
- Berkley, George and John Rouse, *The Craft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New York: McGraw-Hill, 2004).
- Brown, Michael et al., eds., *Debating the Democratic Peace*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1999).
- Buzan, Barry et al., *The European Security Order* (London: Pinter, 1990).

- Calder, Kent and Francis Fukuyama, eds., *East Asian Multilateralism* (Baltimore, Maryland: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2008).
- Carr, E. H., *The Twenty Years' Crisis, 1919-1939* (New York: Harper & Row, 1964).
- Checkel, Jeffrey, "The Constructivist Turn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World Politics*, Vol. 50, No. 2(January 1998), pp. 324-348.
- Claude, Inis, *Power and International Affairs*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62).
- Collins, Allan ed., *Contemporary Security Studie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 Copeland, Dale, "The Constructivist Challenge to Structural Realism,"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5, No. 1(Fall 2000), pp. 187-212.
- Copper, John Milton ed., *Reconsidering Woodrow Wilson* (Baltimore, Maryland: John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2007).
- Dahl, Robert, *Democracy and Its Critics* (New Haven, Connecticut: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9).
- Derian, James Der and M. Shapiro, eds., *International/ Intertextual Relations: Post Modern Readings of World Politics* (Toronto: Lexington, 1989).
- Dewitt, David et al., eds., *Building a New Global Order* (Toronto: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 Dougherty, James and Robert Pfaltzgraff, Jr., *Contending Theorie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New York: Longman, 2003).
- Doyle, Michael W., *Ways of War and Peace* (New York: Norton, 1997).
- Ehrman, John, *The Rise of Neoconservatism* (New Haven, Connecticut: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7).
- Friedman, Thomas, *The World Is Flat* (New York: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2005).
- Fukuyama, Francis, *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 (New York: Free

- Press, 1992) .
- Gilpin, Robert, *War and Change in World Polit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2).
- Gleditsch, Nils Petter, "The Liberal Movement: Fifteen Years on,"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 52, No. 4(December 2008), pp. 691-712.
- Goldstein, Judith and Robert Keohane, eds., *Ideas and Foreign Policy: Briefs, Institution and Political Change* (Ithacca, New York: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3).
- Greestain, F. I. and N. W. Dolsby, eds., *Handbook of Political Science, 8 vols.* (Reading, Mass.: Addison-Wesley, 1975).
- Grieco, Joseph M., "Anarchy and the Limits of Cooperation: A Realist Critique of the Newest Liberal Institutionalism," in David Baldwin ed., *Realism and Neoliberalism: The Contemporary Debat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3), pp. 116-118.
- Haas, Peter M., "Introduction: Epistemic Communities and International Policy Coordination,"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No. 46, No. 1(Winter 1972), pp. 1-34.
- Haass, Richard, "The Age of Nonpolarity," *Foreign Affairs*, Vol. 87, No. 3 (May-June 2008), pp. 44-56.
- Held, David et al., *Global Transformation Politics, Economics and Culture* (Stanford,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 Holsti, K. J., *Peace and War: Armed Conflicts and International Order, 1648-1989*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1).
- Hopf, Ted, "The Promise of Constructivism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3, No. 1(Summer 1998), pp. 171-200.
- Hughes, Owen, *Public Management and Administration: An Introduction* (London: Macmillian, 2003).

- Huntington, Samuel and C. M. Moore, eds., *Authoritarian Politics in Modern Society* (New York: Basic Books, 1970).
- Huntington, Samuel P., *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 and the Remaking of World Order*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1996).
- Huntington, Samuel, *The Political Order in Changing Societies* (New Haven, Connecticut: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68).
- Ikenberry, G. John et al., eds., *The Crisis of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Wilsonism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Princeton,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7).
- Ikenberry, G. John, "The End of the Neo-conservative Moment," *Survival*, Vol. 46, No. 1(Spring 2004), pp. 7-23.
- Jervis, Robert, *System Effects: Complexity in Political and Social Life* (Princeton,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7).
- Judt, Tony, *Dust War: A History of Europe Since 1945* (New York: Penguin, 2005).
- Katzenstein, Peter and Nubuo Okawara, "Japan, Asian-Pacific Security, and the Case for Analytical Eclecticism," *International Security*, 26.3 (Winter 2001-2002), 153-185.
- Katzenstein, Peter ed., *The Culture of National Security*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6).
- Kauppi, Mark and Paul Viotti, *The Global Philosophers* (New York: Lexington, 1992).
- Kegley, Charles and Eugene Wittkopf, eds., *The Global Agenda* (New York: McGraw-Hill, 1998).
- Kennan, George, *Realities of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Princeton,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54).
- Kennedy, Paul, *Preparing for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93).

Keohane, Robert and Joseph Nye, *Power and Interdependence: World Politics in Transition* (New York: Little Brown, 1977).

Keohane, Robert, *After Hegemony* (Princeton,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4).

Keohane, Robert, ed., *Neorealism and Its Critic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6).

Keohane, Robert,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and State Power* (Boulder, Colorado: Westview, 1989).

Keohane, Robert, *Power and Governance in a Partially Globalized World* (London: Routledge, 2002).

Kissinger, Henry A., "Domestic Structure and Foreign Policy," in James Rosenau ed., *International Politics and Foreign Policy* (New York: Free Press, 1969), pp. 261-275.

Kuhn, Thomas, *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2 & 1970).

Martin, Lisa ed., *Global Governance* (London: Ashgate, 2008).

Mearsheimer, John J., *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 (New York: Norton, 2001).

Mearsheimer, John, "Back to the Future: Instability in Europe After the Cold Wa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15, No. 1 (Summer 1990), pp. 7-57.

Mitrany, David, *A Working Peace System* (London: Royal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1943).

Moravcsik, Andrew, "A Libera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51, No. 4 (Autumn 1997), pp. 513-554.

Moravcsik, Andrew, *The Choice for Europe: Social Purpose and State Power from Messina to Maastricht* (Ithaca, New York: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8).

Morgenthau, Hans J., *Politics Among Nations: The Struggle for Power and*

- Peace* (New York: Knopf, 1973).
- Muravchik, Joshua and Stephen Walt, "The Neocons vs. The Realists," *The National Interest*, No. 97(September-October 2008), pp. 20-36.
- Neumann, Iver B and Ole Waever, eds., *The Futur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London: Routledge, 1997).
- Northrop, F. S. C., *The Meeting of East and West: An Inquiry Concerning World Understanding* (New York: Macmillian, 1946).
- Nye, Joseph, "Neorealism and Neoliberalism," *World Politics*, Vol. 40, No. 2 (January 1988), pp. 235-251.
- Paul, T. V. and John A. Hall, eds., *International Order and the Future of World Polit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 Porter, Brian ed., *International Politics, 1919-1969*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2).
- Posen, Barry, "Command of the Commons: The Military Foundation of U.S. Hegemony," in Michael Brown et al., eds., *New Global Danger: Changing Dimensions of International Security*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2004), pp. 3-44.
- Ritzer, George and Douglas Goodman, *Sociological Theory* (New York: Macmillian, 2003).
- Rosecrance, Richard, "War and Peace," *World Politics*, Vol. 55, No. 1 (October 2002), pp. 137-66.
- Rosenau, James and E. Czempiel, eds., *Governance without Governmen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2).
- Rosenau, James, *Along the Domestic-Foreign Frontier*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7).
- Rosenau, James ed., *International Politics and Foreign Policy* (New York: Free Press, 1969).
- Rosenau, James, *Turbulence in World Politics* (Princeton, New Jersey:

-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0).
- Rothstein, Robert, *Planning, Prediction and Policymaking in Foreign Affairs* (Boston, Mass.: Little Brown, 1990).
- Schweller, Randall, "Bandwagoing for Profit: Bringing the Revisionist State Back in,"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19, No. 1(Summer 1994), pp. 72-107.
- Snyder, Glenn, "Mearsheimaer's World- Offensive Realism and the Struggle for Security: A Review Wssay," *International Security*, No. 27(Summer 2002).
- Starr, Paul, *Freedom's Power: The True Force of Liberalism* (New York: Basic Books, 2007).
- Tilley, Charles ed., *The Formation of National States in Western Europ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5).
- Walt, Stephen, *The Origin of Alliances* (Ithaca, New York: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7).
- Waltz, Kenneth,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79).
- Wendt, Alexander, "The Agent-Structure Problem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41, No. 3(Summer 1987), pp. 335-370.
- Wendt, Alexander, *Socia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 Williams, Paul, *Security Studies* (London: Routledge, 2008).
- Wolfe, Alan, *The Future of Liberalism* (New York: Knopf, 2008).



# **Paradigm Development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

**Lin, Bih-jaw**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Diplomacy,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 **Abstract**

The teaching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started in 1919. Since then, the discipline has changed from international politics to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furthermore, to global politics or globalize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is article is dedicated to the ninety years anniversar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the eighty years anniversary of the Department of Diplomacy at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It uses Thomas Kuhn's concept of paradigm to explain and analyze the development and change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 **Key Words**

Paradigm, Realism, Liberalism, Social Constructivism

